

臺北帝國大學與京城帝國大學 史學科之比較（1926-1945）*

葉碧苓**

摘要

日本殖民統治臺灣與朝鮮之後，分別在臺灣設立臺北帝國大學、在朝鮮成立京城帝國大學，兩個殖民地大學皆設有史學科。日本大學史學科國史學、東洋史學、西洋史學三個分科的型態，移植至殖民地後產生了些微變化，殖民地臺灣的臺北帝國大學改西洋史學為「南洋史學」；殖民地朝鮮的京城帝國大學則以「朝鮮史學」取代西洋史學。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南洋史學講座曾先後開設南洋史概說、荷蘭語、西班牙語、日本與南洋各國的歷史關係、歐洲人的南洋發展、臺灣史，以及南洋史專書講讀等課程。17年間（1928-1945），先後有村上直次郎、岩生成一、箭內健次等人任教。培養學生約62名，但僅有柯設階、張樑標2名臺籍學生，惟兩人並未持續從事臺灣史、南洋史相關研究。京城帝國大學史學科設有朝鮮史學2講座，曾先後開設朝鮮史學史、朝鮮歷史地理、新羅王朝史、高麗時代史、李氏朝鮮時代史，以及朝鮮史專書講讀等課程。19年間（1926-1945），先後有今西龍、小田省吾、藤田亮策、末松保和等人任教。培養學生約121名，其中朝鮮籍40名，大約占1/3，其中有多人持續從事朝鮮史相關研究，且成果豐碩。要之，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的講座設置、師資聘任、學生數皆少於京城帝國大學史學科。戰後，日治時期臺北帝國大學留下來的荷、西時期臺灣史轉為中國史研究的附庸，南洋史研究則幾乎完全消失，臺灣大學歷史系轉以中國研究為主；反觀韓國史學則是承繼戰前3分科之遺緒，韓國史、韓中關係史乃至於中國史研究量多質高。

關鍵詞：臺北帝國大學、京城帝國大學、臺灣史、南洋史、朝鮮史

* 本文初稿曾於2008年10月31日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日本帝國殖民地之比較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感謝評論人臺北科技大學鄭麗玲教授、與會之學術先進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編輯委員，提供諸多寶貴的修改意見，謹致謝忱。

**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亞東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來稿日期：2009年2月2日；通過刊登：2009年8月3日。

- 一、前言
 - 二、相關研究回顧
 - 三、課程沿革
 - 四、師資
 - 五、學生修讀情形
 - 六、結論
-

一、前言

近代日本「帝國大學」設置的幕後推手係首任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1840-1909，任期 1885.12-1888.04），以及其文部大臣森有禮（1847-1889，任期 1885.12-1888.04）。1882-1883 年，伊藤前往德國進行憲法考察時，對於促成俾士麥完成德國統一事業的普魯士大學留下深刻印象，遂將德國的大學制度分設神學部、法學部、醫學部、哲學部的模式稍作修改，移植到日本，成為 1886 年 3 月 1 日公布之敕令第 3 號「帝國大學令」的主要內容。自此日本的大學體制由英美體系轉變成德國體系，並根據「帝國大學令」，將原「東京大學」改為「帝國大學」，其下分設法科大學、醫科大學、理科大學、工科大學和文科大學。¹ 德國系統的大學最大特色是設立「講座」制度。戰前日本大學「講座」制的設置始於 1893 年井上毅（1844-1895，任期 1893.03-1894.08）擔任文部大臣時代頒布之「帝國大學令」改正。最初，它的編制是一個講座 1 名教授（或 1 名助教授）。之後，

¹ 此時之「東京大學」係指 1877 年東京開成學校與東京醫學校合併而成之「帝國大學」前身，「帝國大學」名稱之由來係森有禮對「Imperial University」之日文翻譯。「東京大學」設立之初，其下分法學、理學、文學、醫學四部，文學部第一科為史學·哲學·政治學科，但因史學科沒有教授人才，致使學生寥寥無幾，兩年後即被廢止。1897 年「京都帝國大學」成立後，「帝國大學」改稱「東京帝國大學」，戰後又改回「東京大學」沿用至今。參考大久保利謙，《日本の大学》（東京：玉川大学出版部，1997），頁 229、253-254。

根據 1926 年頒布之「大學令」改正，擴大講座編制，改成每一個講座教授 1 名、助教授 1 名，講師與助手等則依據講座性質不同，得聘 1 至 3 名。至於講座的種類、名稱、數量等事宜，則由各帝國大學評議會審議通過後，以敕令規定之。「講座制」要求教授需致力於「專攻一科」，也就是講座教授必須在專業領域中從事研究與教學工作。講座教授權力極大，由講座教授組成之教授評議會，可以決定編制內成員的升等與學位授與等事宜。而每一講座依其性質不同，經費、人員編制也不同。一般而言，可以收「專攻學生」的講座，其經費、人員編制通常都比較多。²

1886 年，日本參考德國大學制度之「帝國大學」正式成立。1887 年，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新設史學科，最初講授課程僅限西洋史。翌年起，於授業科目增加「日本歷史」課程。如此調整係因日本政府於該年 10 月底將內閣臨時修史局廢除，並將修史事業移交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新設之「編年史編纂掛」負責，而原屬修史局之編輯長重野安繹（1827-1910）以及編修久米邦武（1839-1931）、星野恒（1839-1917），亦轉任文科大學教授。文科大學因為上述 3 人的加入，遂於 1889 年以推動日本史教育和研究為由，增設國史科。史學科創設之初，聘任德籍史學家李斯博士（Ludwig Riess，1861-1928）為客座教授，李斯是十九世紀德國歷史學派碩學蘭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的高足，他自 1887 至 1902 年前後 16 年間任教於文科大學，因其影響，史學科與國史科於 1889 年共同創立史學會，由重野安繹出任會長，並創刊《史學會雜誌》（1892 年改稱《史學雜誌》），奠定日本近代學院主義的實證歷史學之礎石。³ 1904 年，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進行體制改革，史學科與國史科合併，改為史學科之下分為國史學、支那史學、歷史學（實為西洋史學）三個分支；1910 年，支那史學改稱東洋史學，西洋史學也正式獨立出來。東洋史學科設有兩個「講座」，市村瓚次郎（1864-1947）負責歷代中國史的課程；白鳥庫吉（1865-1942）講授東洋諸國（朝鮮、滿州、蒙古、

² 所謂的收「專攻學生」的講座，係指需要撰寫畢業畢業論文者。例如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南洋史講座」就是收「專攻學生」的講座；而「西洋史講座」就不是。參考大久保利謙，《日本の大学》，頁 278-279。邱景墩、陳昭如，〈戰前日本的帝國大學制度與臺北帝國大學〉，《Academia：臺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創刊號（1996 年 4 月），頁 4。

³ 東京帝國大學編，《東京帝國大學五十年史》（東京：東京帝國大學，1934），上冊，頁 1296-1303。松村潤，〈白鳥庫吉〉，收於江上波夫編，《東洋学の系譜》（東京：大修館書店，1992），頁 41-42。

西域等)的歷史。⁴自此,日本近代歷史學的三個分科國史學、東洋史學、西洋史學之「學科」體制已然確立。1897年京都帝國大學成立,1906年設立文科大學。1907年文科大學成立史學科,其下亦分國史學、東洋史學、西洋史學三個分支,⁵東洋史學科亦設有兩個講座,分別由內藤湖南(1866-1934)與桑原鷺藏(1871-1931)擔綱。內藤漢學根柢深厚,提倡中國史時代區分論;桑原為白鳥庫吉第一代門生,治學考證嚴密,有乃師之風。⁶

日本明治維新後,第一位正式在學術場域提出「東洋」論者,係1880年東京大學哲學科第一屆畢業生井上哲次郎(1856-1944)。1881年,井上進入文部省御用掛任職,受加藤弘之(1836-1916)委託,在編輯局編輯「東洋哲學史」,又與杉浦重剛(1855-1924)等人創辦《東洋學藝雜誌》。1882年,井上轉任東京大學古典講習科助教授,負責「東洋哲學」和「論理學(邏輯學)」課程。「東洋哲學」課程是繼1881年政治科設置的「印度及支那哲學」講座之後,日本的大學首次出現以「東洋」為「西洋」的對語,指涉以中國、印度為主的學問。而井上之提倡「東洋哲學」,也引發日本史學界研究「東洋學」的熱潮。⁷1891年,井上進而於公開演講場合提出「東洋史學」係東洋學問的代表,發揮其「學術」價值乃日本人的使命。⁸

日本史學教育將外國歷史分為「西洋史」與「東洋史」,實為世界各國僅有,最早提出此一觀念者為蒙古史研究先驅那珂通世(1851-1908)。1894年,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嘉納治五郎(1860-1938)為研究調查中等學校各學科之教授、課程等意見,召集同校及各大學、高等中學校教授開會商討,會中那珂與三宅米吉(1860-1929)提議將中學歷史科之外國歷史二分為西洋史與東洋史,獲得出席

⁴ 中嶋敏,〈市村瓚次郎〉,收於江上波夫編,《東洋学の系譜》,頁26-27;松村潤,〈白鳥庫吉〉,收於江上波夫編,《東洋学の系譜》,頁43。

⁵ 京都帝國大學史學科自1907年成立起即使用「東洋史學」而不使用「支那史學」,比東京帝國大學1910年才將「支那史學」改為「東洋史學」要早了3年。

⁶ 溝上瑛,〈內藤湖南〉,收於江上波夫編,《東洋学の系譜》,頁51-53;礪波護,〈桑原鷺藏〉,收於江上波夫編,《東洋学の系譜》,頁134-139。

⁷ 參考陳瑋芬,《近代日本漢學的「關鍵詞」研究:儒學及相關概念的嬗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頁104-108。

⁸ 井上哲次郎,〈東洋史學の價值〉,《史學雜誌》(1891年11月)。轉引自朴光賢,〈京城帝國大學と「朝鮮學」〉(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大学院人間情報學研究科博士論文,2002),頁51。

者贊同，此係「東洋史」科目名稱之發端。那珂創倡「東洋史」，除了因不滿當時史學教育以歐洲史為主之世界史（萬國史）現象外，尚有外在大環境的因素。1894年，正值中日戰爭爆發，日本開始侵略亞洲大陸之際，日本的近代國家意識急速上昇，迫切需要瞭解以中國為中心的東洋諸國治亂興亡之大勢，以及中國、突厥、女真、蒙古等人種之盛衰消長。因此，那珂提倡教授東洋史，基本上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思潮息息相關。⁹ 1897年，市村瓚次郎將5年前刊行的《支那史》6卷，改編為《東洋史要》全二冊刊行，此書曾於短期內再版數十次。翌年，桑原鷺藏也出版《中等東洋史》，此係日本學界第一批東洋史著作。¹⁰

相較於中學歷史教育，東京帝國大學史學科直到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期間，才出現「支那史學」科；1910年日韓合併之際，才將「支那史學」改為「東洋史學」，時間上稍慢了一些，而促成此一決定性改變的人物，正是自1904年起擔任該科教授的白鳥庫吉。白鳥係史學科第一屆畢業生，曾受教於李斯、坪井九馬三（1861-1928）與重野安繹，並於1901-1903年赴歐洲留學。白鳥認為日本作為東洋的指導者，除了向世界展示國威之外，在學問方面也應該儘早與西歐並肩齊行。尤其當時歐美人在東洋方面的研究主要關注於中國、蒙古、中亞，尚未涉足滿洲（中國東北）與朝鮮，因此白鳥認為滿洲與朝鮮的歷史地理研究應該在日本人的手中依序完成。¹¹ 戰前日本的東洋史研究隨著日本對亞洲的軍事行動而展開，大致依朝鮮→滿蒙→中國→東南亞的路線發展，充滿學術與政治結合的特色。¹²

日本在殖民統治臺灣與朝鮮之後，將「帝國大學」的模式移植至殖民地，分別在臺灣設立臺北帝國大學、在朝鮮成立京城帝國大學，這兩所殖民地大學也都設有史學科。戰前日本大學史學科國史學、東洋史學、西洋史學三個分科的型態，移植至殖民地後產生了些微變化。殖民地臺灣的臺北帝國大學改西洋史學為「南洋史學」；殖民地朝鮮的京城帝國大學則以「朝鮮史學」取代西洋史學。事實上，不論「南洋史」或「朝鮮史」，都在「東洋史」的範圍內，但為了配合殖民地統

⁹ 三宅米吉，〈文學博士那珂通世君傳〉，收於故那珂博士功績紀念會編，《那珂通世遺書》（東京：大日本圖書，1915），頁11。轉引自田中正美，〈那珂通世〉，收於江上波夫編，《東洋学の系譜》，頁2-4。

¹⁰ 陳瑋芬，〈近代日本漢學的「關鍵詞」研究〉，頁108-109。

¹¹ 松村潤，〈白鳥庫吉〉，收於江上波夫編，《東洋学の系譜》，頁43-46。

¹² 旗田巍，〈日本における東洋史学の伝統〉，《歴史学研究》270（1962年11月），頁28。

治需要，兩所殖民地帝國大學與日本內地之帝國大學肩負著不同的使命，遂採「因地制宜」之設計方針。因此，本文擬根據檔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臺灣大學校史檔案）、統計要覽、個人回憶文字與學術成果，以及報章雜誌等資料，從課程沿革、師資、學生修讀情形三個層面，綜合探討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兩所殖民地帝國大學史學科之設置，特別是以臺北帝國大學「南洋史」和京城帝國大學「朝鮮史」兩個特殊講座為主要分析對象，深入探究其「因地制宜」之差異性。

二、相關研究回顧

近年來，殖民地教育制度之相關研究已頗受學界重視，有關兩所殖民地帝國大學教育制度及其內容也有頗多可觀之論述，此處不再一一贅述。其中與本論文有直接相關之論文有韓國學者白永瑞〈想像のなかの差異、構造のなかの同一：京城帝國大學と臺北帝國大學の比較からみる植民地近代性〉、¹³ 〈「東洋史學」的誕生與衰退：東亞學術制度的傳播與變形〉¹⁴ 兩篇文章，以及吳密察著、食野充宏譯，〈植民地大學とその戦後〉一文。¹⁵

韓國學者白永瑞〈想像のなかの差異、構造のなかの同一：京城帝國大學と臺北帝國大學の比較からみる植民地近代性〉一文，以「想像中的差異性、構造上的同質性」看待兩所殖民地的帝國大學，討論兩地殖民地近代性的異同，提出戰後兩地的歷史「想像」雖然普遍給人差異很大的觀感，但若從日本戰前以近代國家之姿支配東亞的結構來看，兩校的性質實則是「大同小異」。白氏認為儘管兩校創設背景不盡相同，但事實上都是肩負「國策大學」的使命。亦即京城帝國

¹³ 白永瑞，〈想像のなかの差異、構造のなかの同一：京城帝國大學と臺北帝國大學の比較からみる植民地近代性〉，《現代思想》30:2（2000年2月），頁8-17。

¹⁴ 本文曾以〈「東洋史學」在大學學術制度中的興衰：以20世紀東洋地區為觀察〉為題，發表於2003年12月17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之「中國近代知識轉型與知識傳播學術研討會」。經修改後正式發表為〈「東洋史學」的誕生與衰退：東亞學術制度的傳播與變形〉，《臺灣社會研究季刊》59（2005年9月），頁269-294。為顧及筆者理解白氏觀點的周延性，此處以正式發表之內容為討論之主體。

¹⁵ 吳密察著、食野充宏譯，〈植民地大學とその戦後〉，收於吳密察等編，《記憶する台湾：帝国との相剋》（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

大學之設立係配合日本「北進」中國大陸的政策，因此「東洋文化的研究」與「國家需要的學問」成為京城帝國大學創設的「正統理念」。課程設計除了韓國的文學、歷史以及漢藥的研究之外，有關「中國大陸文化」的研究也是京城大學的重點發展特色。開設之初，優先設立有關「朝鮮文化研究」的講座，法文學部之下設有「朝鮮語學·朝鮮文學」講座、「朝鮮史學」講座、「宗教學·宗教史」講座；醫學部則有「藥物學」講座等。¹⁶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該校明顯亦扮演日本侵略中國滿洲（東北）、內蒙的輔助機關之角色。1932年，該校成立「滿蒙文化研究會」；1938年，隨著日軍在中國戰爭範圍的擴大，改名為「大陸文化研究會」，同時組成「蒙疆探險隊」。1939年設置附屬生藥研究所與濟州島試驗場，1941年成立高地療養研究所，1945年成立大陸資源科學研究所。這些研究、調查的成果都是日本北進政策的重要參考。

臺北帝國大學則因位處日本帝國的南方邊陲，配合「南進」政策之推動，致力於南支南洋地區自然和人文的研究和開發。其在文政學部設有南洋史學、土俗人種學和言語學、心理學等講座；理農學部則設有農學·熱帶農學、製糖化學等講座。1936年8月，南進政策正式列入日本的「國策的基準」後，臺北帝國大學的學術研究領域和課題，就因應此種南方發展的局勢邁向新的階段。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先後占領東南亞各地，為因應南方資源的調查開發和研究利用，臺灣總督府乃自南方施政經費中撥款，在臺北帝國大學增設兩個研究機構：一為以文政學部學者為中心的南方人文研究所；一為以農學部和理學部學者為中心的南方資源科學研究所，兩所分掌南方人文、科學之研究事宜。白氏以「國策大學」觀點總括京城帝國大學與臺北帝國大學之特殊使命，筆者亦表贊同，因此筆者之博士論文〈臺北帝國大學與日本南進政策〉，即從此一觀點出發，深入探討臺北帝國大學在近代日本南進政策中扮演的角色，周詳的論述臺北帝國大學南方研究之成果。¹⁷ 但平心而論，兩校從事相關研究之學者參與相關調查、研究的動機並非全是為政治服務，因此不宜以政治工具的角度全盤予以否定，此亦筆者撰寫博士論文與本文之基本理念。

¹⁶ 鄭圭永，〈京城帝国大学に見る：戦前日本の高等教育と国家〉（東京：東京大学博士論文，1995），頁85-87。

¹⁷ 葉碧苓，〈臺北帝國大學與日本南進政策〉（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

白永瑞近年來發表一系列文章，強調為了結束東亞人當前所面臨的歷史認識之矛盾，需要重構東亞各國的歷史教科書和歷史教育。此一理念之具體成果即為中、日、韓三個國家的學者和市民團體共同編寫的《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¹⁸ 白氏在〈「東洋史學」的誕生與衰退：東亞學術制度的傳播與變形〉一文，開宗明義提到此文的撰寫係其關於東亞近代歷史學演變軌跡研究的敘說，從「制度內」的與「制度外」的學術相互對立、交融的動態過程，來把握東亞近代歷史學的演變軌跡。文中白氏針對日本大學歷史分科中獨創之「東洋史學」如何在日本起源，又移植至京城帝國大學，乃至對中國近代歷史「學科體制」的傳播過程做了歷史回顧。

白氏認為：「甲午戰爭以後所出現的，具有『日本獨立特色的學問』的東洋史學，隨著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的失敗而被納入到世界史之內，事實上已經宣告它的消亡。」戰後日本大學史學3分科制依然存在，因而在學問上將包括日本在內的東亞地域作為一個主體來思考的努力還相當少。筆者同意白氏提出在當今全球化的課題持續受到高度關注的情形下，歷史學除了維持本身特性的同時，超越作為分科學問的東洋史學，樹立「批判的、歷史的東亞學」實有其必要性。但是，筆者以為「東亞（史）學」的建立與3分科制度的存在與否並無直接對應關係，擺脫有「意識型態的史觀」，應該是研究任何地域、時代的歷史學者都必須時時存在心中的基本理念。誠如白氏認為韓國史學界：「不僅要關注作為制度的學問分科之一的韓國史的研究成果，而且更應積極地從韓半島（朝鮮半島）在歷史和現實中所面臨的問題，導入整體東亞研究視域，以韓國主體視角重新構想東亞（史）。」此一觀點同樣適用於當前的臺灣史學界，亦可適用於中國、日本。然而，筆者認為重視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的實證研究依然有其存在必須性。畢竟，歷史學的研究若脫離了檔案、文獻、遺跡等史料，那和其他文化學、社會學等學科的區隔恐怕將會消失。

¹⁸ 此書中文版以《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為書名；日語版以《未来をひらく歴史》（開創未來的歷史）為書名，加上「東アジア三國の近現代史」（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為副標題；韓語版亦以《미래를 여는 역사》（開創未來的歷史）為書名。已經在2005年5月分別在三國正式出版。參考白永瑞，〈東亞歷史教科書和歷史教育〉，《二十一世紀》90（2005年8月），頁4-13。

吳密察著、食野充宏譯，〈植民地大學とその戦後〉一文，以戰前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與戰後臺灣大學文學院歷史系為中心，從臺北帝國大學的成立、殖民時期之發展，以及戰後改編成臺灣大學之過程，探討臺灣戰前戰後有關殖民地化/「脫殖民地化」的過程與性質。誠如吳密察提到的，臺北帝國大學在成立前後臺、日學者持正反意見者皆有，但其確實肩負日本帝國之南方文化之「中心」，具有「國策大學」的使命。以史學科為例，不論其以南洋史、東洋史、國史3分科制的講座設置是否具有殖民地化的考量；先後任教之師資與畢業生等之研究業績，既非當時日本帝國範圍內的最高水準，與同時期東亞地區中國、香港、馬尼拉等地的殖民地大學相比，也並非最為突出，但不論我們是否對其認同或是質疑，都應該將之視為臺灣史學史的一部分。戰後初期，臺灣大學因為轉向以教學為主的型態，致使歷史系的教授大多「述而不作」，或者出版的著作多為其課堂講義。直到1970年代起，受完備學術訓練的新世代出現，臺灣史學界的學術研究水準才逐漸回復。筆者基本上贊同吳氏此一觀點，但戰後這批來臺學者研究成果不佳的情況，除了「能力」不足以活用臺北帝國大學時代遺留下來的圖書與研究成果外，「職業學生」的監督與「白色恐怖」的陰影，恐怕也是必須列入考量的背景。

白氏之研究係以「宏觀」的角度看待日本兩所殖民地帝國大學之設置，認為兩校實為「大同小異」；而筆者則希望從「微觀」的角度出發，藉由史學科之比較以看出兩校之「差異性」。吳文以1945年為界，探討二戰前後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與臺灣大學歷史系如何承繼與轉變；筆者則希望進一步詳細探討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之課程、師資、學生研讀情形之詳細狀況，而非僅止於吳文所述之講座業績。同時，將之與京城帝國大學史學科相互比較，而非僅止於單純敘述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設置情形而已。上述白、吳兩位學者之研究成果係筆者撰寫此文主要的參考基礎與動機。誠如白氏所言，要做戰前日本兩所殖民地帝國大學的比較研究，困難度很高。筆者有感於目前不論是臺灣、韓國、日本學界，關於兩所殖民地帝國大學史學科之比較研究，仍無專文論述之，因此不揣孤陋，試撰此文，就教於學界先進。

三、課程沿革

(一)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之課程

1928年，臺北帝國大學創立，創立之初設文政和理農兩學部。該校自成立以來，即在日本帝國的南方邊陲配合「南進」政策之推動，致力於南支南洋地區自然和人文的研究和開發。根據同年2月頒布之「文政學部規程」，文政學部分為文學科、史學科、哲學科及政學科。其中，文政學部史學科設有國史學、南洋史學及東洋史學3個分支（專攻講座），還設置了輔助學科性質的土俗學·人種學、西洋史學·史學地理學等5個講座。¹⁹南洋史學和土俗人種學講座係大學創設時特別設立之講座，乃史學科的特色。

以臺北帝國大學南洋史講座為例，進入該專攻講座就讀的學生，修業年限為3-6年，除撰寫畢業論文外，必修科目有：南洋史概說、南洋史特殊講義、南洋史講讀及演習共5單位，土俗學·人種學1單位，國史學、東洋史學、西洋史學史學地理學各3單位、其他學科內選修4單位，共19單位。1931年起，改為史學概論、國史概說、東洋史概說、南洋史概說、西洋史、地理學、土俗學人種學等共通必修科目各1單位，南洋史特殊講義、南洋史講讀及演習共4單位，國史、東洋史各2單位，其他學科內選修5單位，共20單位。另外，依據《文政學部規程》規定，除了必修科目之外，尚必須在英語、德語、法語中擇一修習2年。由於入學的學生在高等學校或預科時，大多已經學過英語和德語，所以進入大學後外語的選修主要是以法語為主。此外，南洋史專攻的學生尚需接受西班牙文及荷蘭文的訓練。根據中村孝志（1910-1994）的回憶，當時南洋史學講座的學生是很忙碌的，因為有「歐洲語言學大師」之稱的村上直次郎（1868-1966）對語言的要求是很嚴格的：

¹⁹ 5個講座依成立時間先後，分別為：1928年東洋史講座、土俗學·人種學講座，1929年國史學講座、南洋史學講座，1930年西洋史學·史學地理學講座。松本巍著、崩通林譯，《臺北帝國大學沿革史》（臺北：崩通林，1960），頁6。

要研究殖民地時代的東南亞史，至少必須要修習幾種語言。我們在高等學校時就修了英語和德語，在文政學部兩年的法語是必修的，更進一步被要求要修習西班牙語及荷蘭語。因為大學三年就要寫畢業論文，最遲在大學二年級後半階段就不能不具有相當程度的語學基礎。因為村上老師是歐洲語言學大師，學生在大學一年級的後半階段開始利用午休的時間，接受課外的（例如像西班牙語）速成訓練。到二年級時用這樣的西班牙語開始講讀史籍。在此同時，學生被要求修習新的荷蘭語課程。大體隔年西班牙語和荷蘭語交替作為主修，一般說來前者的學生以菲律賓、後者的學生以關於荷領東印度關係的題目作為主修來寫畢業論文。²⁰

初學新語言時由村上教授，到了開始講讀史籍（教材即附錄之表一「南洋史講讀及演習」課程所列之內容）之後，則每次由一位學生負責主讀、翻譯，2小時所讀的份量大約只有打字稿6、7頁，在主讀前4、5日會發下，而每次輪到主讀的學生為了準備次日的功課，經常都是徹夜未眠，戰戰兢兢的準備。另外，根據岩生成一（1900-1988）的回憶，村上任教臺北帝國大學8年間，每逢午休的語學時間他都會全程旁聽。而且他都會和學生一起在教室恭候村上蒞臨，彷彿他也是學生之一，而非該講座的助教授。²¹

茲以1929-1941年間南洋史學相關課程為例，列表說明其課程開設情形，詳如附錄之表一。根據表一顯示，村上在臺北帝國大學服務8年時間，曾開設南洋史概說、荷蘭語、西班牙語、日本與南洋的歷史關係、歐洲人的南洋發展、臺灣史，以及南洋史專書講讀等課程。岩生曾開設南洋史概說、荷蘭語、日越交涉史、日泰交涉史、荷領東印度史、泰國外交史、日本人在南洋發展史、南洋華僑史、近代臺灣史、明鄭時期臺灣史，以及南洋史專書講讀等課程。箭內健次曾開設日菲交涉史、菲律賓外交史、菲律賓產業發展、菲律賓社會、西班牙語，以及南洋史專書講讀等課程。然而，根據中村孝志的回憶，他以南洋史講座專攻畢業生的立場，對上述3人開設的課程似乎並非全是正面評價，中村認為：村上直次郎因

²⁰ 中村孝志撰、陳俐甫譯，〈臺北帝國大學的日子〉，《Academia》創刊號（1996年4月），頁178。

²¹ 岩生成一等，〈先學を語る、村上直次郎博士〉，收於財團法人東方學會編，《東方學回想Ⅰ：先學を語る（1）》（東京：刀水書房，2000），頁149。

為已經是以日歐交涉、天主教史等聞名的學者，所以對東南亞當地史料持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態度，因此採用歐洲的史料、文獻，進行西力東漸的講課，由今日看來「完全是殖民地史觀的立場」。而岩生成一也因自己是國史專攻出身，除了持續進行南洋的日本人町等研究之外，上課內容有很大部分是屬於日本對外交涉史的領域。雖說是南洋史講座的課程，卻全然沒有今天採取東南亞當地史料進行地域研究的情況。只有他剛剛自歐洲留學回來的年輕時期，²² 曾致力於東南亞史文獻史料的解題、基礎性業績和研究之動向等。村上老師辭職以後，接任的箭內健次也是國史專攻出身，使用西班牙語文獻開始菲律賓史的研究。²³ 足見 3 人開設的課程是以個人專長或研究重點為優先考量，也就是研究與教學合一，而非全然是從「南洋史」講座「必須」開設的課程這個角度去思考。

總計，1929-1941 年間臺灣史相關課程只開設過 4 種，分別為村上：1933 年「南洋史講讀及び演習」(Alvarez: Formosa Geographica de Historicamente Considerada)，1935 年「南洋史特殊講義」(臺灣史)；岩生：1938 年「南洋史特殊講義」(近代臺灣史の諸問題)，1940-1941 年「南洋史特殊講義(近世臺灣史・特に鄭氏の活動を中心として)」，比例上似乎稍低了一點。事實上，村上的授業師李斯著有《臺灣島史》²⁴ 一書，大量徵引西方傳教士的報告、書信，以及荷蘭檔案，闡明許多過去所不知的史實，頗有創見，雖然他對某些漢文典籍解讀有誤，亦被認為缺失不少，²⁵ 但仍然適合做為講讀及演習的教材，卻未見村上採用。此外，1930-1931 年間兩度來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客座的市村瓚次郎，曾於 1900 年八國聯軍進攻北京時，受日本政府之命進入北京城調查相關的文獻與史料，市村依據其於紫禁城內閣東大庫發現之明末清初鄭氏相關史料，發表〈清初臺灣の鄭氏に關する文書〉一文，²⁶ 但客座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期間卻未開設相關課程，

²² 岩生成一於 1930-1932 年赴荷、英、荷領東印度、義、西、葡等國留學。

²³ 中村孝志撰、陳俐甫譯，〈臺北帝國大學的日子〉，頁 179-181。

²⁴ Ludwig Riess 著、吉國藤吉譯，《臺灣島史 (Geschichte der Insel Formosa)》(東京：富山房，1898)。

²⁵ 有關 Ludwig Riess 博士及其所著之《臺灣島史》之評價，可參考むな生，〈梗概及評論：臺灣島史〉，《史學雜誌》8: 6 (1897 年 6 月)，頁 602-604；編者，〈彙報：臺灣島史之行衛〉，《史學雜誌》11: 1 (1900 年 1 月)，頁 98-99；吳文星，〈日治初期日人對臺灣史研究之展開〉，收於中華民國史專題討論會秘書處編，《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四屆討論會》(臺北：國史館，1998)，頁 2020-2021。

²⁶ 市村瓚次郎，〈清初臺灣の鄭氏に關する文書〉，《史學雜誌》13: 9、10、12 (1902 年 9、10、12 月)。轉引自中見立夫，〈日本の東洋史学黎明期における史料への探求〉，收於神田信夫先生古稀記念論集編纂委員會編，《清朝と東アジア：神田信夫先生古稀記念論集》(東京：山川出版社，1992)，頁 100-104。

亦未繼續研究類似主題。²⁷

針對此一現象，楊雲萍（1906-2000）在 1939 年於《臺灣日日新報》上發表文章，批評臺北帝國大學不重視臺灣的文學、歷史等相關研究。楊氏認為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沒有如京城帝國大學發展出「朝鮮學」之教學、研究的特色，而主張臺北帝國大學的特色應該以研究「臺灣」為主，應該增設「臺灣史講座」、「臺灣文學講座」、「廈門語講座」。楊氏指出：臺灣史的研究可以連橫（1878-1936）、伊能嘉矩（1867-1925）等人的成果為基礎，「臺灣史講座」的課程則可以分成「荷蘭時代」與「鄭氏以後」兩部分。²⁸ 然而，筆者認為以當時的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之師資，若要依楊雲萍的構想開設「臺灣史講座」課程，實有極高的困難度。1939 年，村上直次郎已經辭職回日本，以繼任的岩生成一之研究取向，可以開設的課程大致局限於荷西至鄭成功時代；箭內健次的研究則以南洋史為主，要他們二人開設清治時期（1683-1895）的臺灣史課程恐怕是強人所難。

根據吳密察教授的研究，清治時期幾乎沒有臺灣人以臺灣為對象，進行可稱之為歷史的撰作，僅有的鄭用錫（1788-1858）《淡水廳志》也並未付梓，直到 1998 年才由林文龍點校、臺灣省文獻會正式出版。²⁹ 1895 年，依據馬關條約的簽訂，臺灣進入日本殖民統治時代，「割讓」這個重大的衝擊，讓臺灣的知識分子普遍有被遺棄的挫折感，也因此激發歷史意識，不少記載割讓歷史的著作陸續出版。二十年後，始有臺灣人自己寫的第一本通史——連橫《臺灣通史》的出現。³⁰ 1922 年 4 月，臺灣第一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1855-1930，任期 1919.10-1923.09）為了宣示臺灣之殖民統治進入新的階段，宣揚日本在臺之統治實蹟，遂成立「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希望以 3 年時間搜集、編纂臺灣統治 25 年（1895-1919）之史料，並撰成日本統治時期歷史為主的「新臺灣史」。³¹ 然而，就在主要成員

²⁷ 市村瓚次郎來臺講授的課程為兩宋思想史與中國古代史，其長子市村毅（1892-?）係臺北帝國大學地質學教授，這或許是市村到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客座的原因之一。此外，除了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外，市村也曾到京城帝國大學史學科客座講學。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編，〈彙報〉，《史學科研究年報》（臺北：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1934），第一輯，頁 452-453；中嶋敏，〈市村瓚次郎〉，江上波夫編，《東洋学の系譜》，頁 27。

²⁸ 楊雲萍，〈國立臺灣大學と臺灣の研究（中）〉，《臺灣日日新報》，1939 年 2 月 16 日，第 3 版。

²⁹ 鄭用錫著、林文龍點校，《淡水廳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

³⁰ 吳密察，〈「歷史」的出現〉，收於黃富三等主編，《臺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頁 12-21。

³¹ 〈時報：臺灣史料編纂委員會の創設〉，《臺灣時報》35（1922 年 6 月），頁 3-4。

持地六三郎（1867-1923，部長）、田原禎次郎（1868-1923，主查）相繼去世，經費又被大幅刪減的情形下，「新臺灣史」的修史事業遂告中斷。不過這項事業卻因此讓負責清代臺灣的伊能嘉矩，完成了《臺灣文化誌》三大冊的巨作。³² 楊雲萍在 1939 年於《臺灣日日新報》上發表之文章不僅點出連雅堂（橫）、伊能梅陰（嘉矩）兩人在臺灣史研究的重要性，自己也開始身體力行從事臺灣史的研究。³³ 二戰後 1947 年 7 月，楊氏任教臺灣大學歷史系，開設臺灣史上第一次的「臺灣史」課程，³⁴ 可謂水到渠成。

（二）京城帝國大學史學科之課程

1926 年，京城帝國大學成立，創立之初設有法文學部和醫學部，法文學部其下設法學科、哲學科、史學科、文學科。其中，法文學部史學科設有國史學、朝鮮史學、及東洋史學三個分支，還設置了輔助學科性質的考古學、地理學及西洋史學講座。朝鮮史學科設有兩個講座，乃該校的「看板（樣板）講座」之一。³⁵

進入京城帝國大學史學科朝鮮史學專攻就讀的學生，修業年限 3-6 年，除撰寫畢業論文外，必修科目有：共通科目史學概論、國史學普通講義、朝鮮史學普通講義、東洋史學普通講義、西洋史學普通講義（2 單位）、考古學、地理學、教育學普通講義（2 單位）等 10 單位選修 8 單位，朝鮮史學概說、朝鮮史學特殊講義、朝鮮史學演習共 8 單位，朝鮮語學及朝鮮文學 1 單位，其他哲學科、文學科、法學科之科目選修 2 單位，共 19 單位。1935 年改為共通科目，全部必修 10 單位，朝鮮史學普通講義 2 單位、朝鮮史學特殊講義及演習 4 單位，國史學與東洋史學科目 3 單位，西洋史學 1 單位、朝鮮語學及朝鮮文學普通講義 1 單位，其他哲學科與文學科之科目選修 1 單位，共 22 單位。1941 年再修改為朝鮮史學講義及演習 7 單位，國史學、東洋史學、西洋史學 7 單位，史學概論、考古學、地理學各

³² 伊能嘉矩生前完成的 54 冊「臺灣全志」初稿，由其愛徒板澤武雄和民俗學家柳田國男重新整理，改題為《臺灣文化誌》上、中、下，於 1928 年由刀江書院正式出版。

³³ 許雪姬，〈楊雲萍教授與臺灣史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報》39（2007 年 6 月），頁 1-75。

³⁴ 歐素琪，〈傳承與創新：戰後初期臺灣大學的再出發（1945-1950）〉（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2006），頁 236。

³⁵ 同樣的，朝鮮語學·朝鮮文學是該校文學科的「看板講座」，也設有兩個講座。此外，東洋史講座亦設有兩個講座。比較特別的是國史學講座，1926 年設校時僅有 1 個講座，1929 年才增設國史學第 2 講座。鄭圭永，〈京城帝國大学に見る〉，頁 93-99、134；朴光賢，〈京城帝國大学と「朝鮮学」〉，頁 66。

1 單位，其他文學科之科目選修 3 單位，共 20 單位。³⁶ 朝鮮史學第一講座之課程以新羅史及考古學、金石學為主；第二講座則以李朝時代為主，旁及高麗時代、古代史，詳細之課程資料尚有待進一步考察，目前僅知 1933-1944 年間末松保和（1904-1992）曾開設之朝鮮史學相關課程，詳如表二。

根據表二顯示，十餘年間末松曾在京城帝國大學朝鮮史學科開設朝鮮史學史、朝鮮歷史地理、新羅王朝史、高麗時代史、李氏朝鮮時代史、李朝與明代關係史、上古日鮮關係史、任那史，以及朝鮮史專書講讀等課程。對照臺北帝國大學南洋史學講座的課程，除了臺灣史、南洋史等相關課程，村上等人尚需開設荷蘭語、西班牙語等語言課程；而京城帝國大學朝鮮史學科的課程較為單純，任教者只需專注於朝鮮史相關課程即可，不需額外分擔語言課程。一般而言，朝鮮學生漢文能力都有一定的水準，如果學生閱讀漢文典籍的能力不足時，只要到該校文學科選修支那語學（中國語學）·支那文學（中國文學）講座之課程即可。³⁷ 因此，似乎並未出現像臺北帝國大學南洋史講座需要利用午休時間加強語言訓練的情形。

從未松保和的開課內容來看，最富爭議的課程當屬 1944 年開設之「朝鮮史學普通講義（日鮮關係：上代、任那史）」。上古日鮮關係史、任那史的內容指的就是所謂的「任那日本府」，亦即四世紀中葉（朝鮮半島三國時代，日本列島古墳時代）大和王權在朝鮮半島南部任那（今慶尚南道金海市一帶）的統治機構。當時的日本學者認為百濟在受到高句麗與新羅入侵時曾向大和王權求援。直到西元六世紀中期，任那為新羅吞併，日本府才滅亡。戰前末松等朝鮮史學者根據〈廣開土王碑〉與《日本書紀》等日本史書及中國與朝鮮的史書中日本曾在朝鮮半島有一定影響力的紀錄，來論斷「任那日本府」的興亡歷史。³⁸ 而日本政府亦藉此作為「征韓論」、「日韓合併」的重要歷史依據之一。戰後，包括末松保和本身在

³⁶ 京城帝國大學，《京城帝國大學一覽》（京城：京城帝國大學，1940），昭和 15 年版，頁 72-73；京城帝國大學，《京城帝國大學一覽》（京城：京城帝國大學，1942），昭和 17 年版，頁 72-73；鄭圭永，〈京城帝國大学に見る〉，頁 97。

³⁷ 京城帝國大學文學科支那語學·支那文學講座先後有兒島獻吉郎（1866-1931）、辛島驍擔任講座教授。兒島的《中國文學概論》、《中國文學通論》、《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學研究》等著作在 1930 年代就有中文翻譯本在中國流通，辛島專長為宋詩與元曲。此外，魏建功（1901-1980）北京大學畢業後，亦曾於 1927-1928 年間赴京城帝國大學擔任中國語教師。參考鄭圭永，〈京城帝國大学に見る〉，頁 134；關志昌，〈魏建功〉，收於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臺北：傳記文學雜誌社，1984），第 6 冊，頁 475-478。

³⁸ 末松保和，《任那興亡史》（東京：大八洲出版，1949）。

內及其他日本學者井上秀雄、吉田晶、坂元義種陸續提出修正日本統治機構存在的說法。³⁹ 韓國學者朴天秀亦從「考古學」的發現，認為《日本書紀》等記錄大和王權對任那的直接統治實屬誇張。⁴⁰ 韓國學者柳鏞泰亦認為日本扶桑社中學歷史教科書《中學社會：新しい歴史教科書》，以及 1990 年代末期以來中國出版之世界史、亞洲史等相關書籍中仍存在這段歷史的描述，乃是中國與日本對韓國古代史的認識，依然有「中華民族史觀」與「日帝殖民史觀」並存的現象，係蔑視鄰邦、忽視小國的心理，值得東亞三國深入省察。⁴¹

日本明治維新後，明治政府於明治 5 年（1872）年底發布太政官布告第 342 號，宣布「以神武天皇即位之年定為紀元元年」，⁴² 此即所謂「皇紀」之紀年法法制化的開始。日本史學界依《古事記》、《日本書紀》等「記紀」神話，將神武天皇從「神皇」變成「人皇」，日本歷史「向上延伸」。1940 年（昭和 15 年），「皇紀二千六百年」，日本政府動員全國（包括日本本國、殖民地臺灣、朝鮮等日本控制勢力下的區域）民眾舉行史無前例的一連串奉祝活動，藉以對「國民」進行精神總動員。⁴³ 然而，面對 1910 年被日本合併的朝鮮的歷史，日本學者的態度卻大不相同。1915 年 7 月，朝鮮總督府開始著手「朝鮮半島史」編纂工作，歷經二十餘年，直到 1938 年 3 月，完成《朝鮮史》37 冊之刊行。⁴⁴ 在編輯過程中，朝鮮史「起源」問題係日、朝委員之間爭論的焦點。朝鮮籍委員崔南善（1890-1957）等人數度提出檀君、箕子是朝鮮史的重要部分，⁴⁵ 應該納入第一編之首，但編修

³⁹ 末松保和，《末松保和朝鮮史著作集 4：古代の日本と朝鮮》（東京：吉川弘文館，1996）；井上秀雄，《古代朝鮮》（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72）；吉田晶，《日本と朝鮮の古代史：共同研究》（東京：三省堂，1979）；坂元義種，《古代東アジアの日本と朝鮮》（東京：吉川弘文館，1978）。

⁴⁰ 朴天秀，《加耶と倭：韓半島と日本列島の考古学》（東京：講談社，2007）。

⁴¹ 柳鏞泰，〈東北亞歷史紛爭的論理及其淵源：為了溝通的省察〉，《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History 4: 2》（2007 年 12 月），頁 128-139。

⁴² 古川隆久，《皇紀・万博・オリンピック：皇室ブランドと經濟發展》（東京：中央公論社，1998），頁 2。

⁴³ 蔡錦堂，〈「紀元二千六百年」的日本與臺灣〉，《師大臺灣史學報》1（2007 年 12 月），頁 51-88。

⁴⁴ 朝鮮史編修會編，《朝鮮史》（京城：朝鮮總督府，1932-1938），第 37 冊。

⁴⁵ 檀君（2333BC-2240BC），名王儉，傳說是檀君朝鮮的開國國君。據《三國遺事》·紀異之記載，王儉乃天神桓雄與熊女棲梧結合而生。檀君於公元前二千年左右建立檀君朝鮮，都平壤，所以平壤有王儉城的別稱。箕子朝鮮傳說是在公元前 12 世紀到前 2 世紀期間由箕子在朝鮮半島北部與當地原著民一起所創立的政權，根據《史記》記載箕子朝鮮據說是商朝的遺臣箕子建立。參考〈朝鮮歷史——維基百科〉，網址：<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F%93%E5%9C%8B%E5%8F%B2>，下載日期：2009 年 7 月 20 日。戰後，韓國民族史學者極力爭取將這兩段歷史納入韓國古代史的範疇，並寫入歷史教科書，因其頗富爭議性，尚未有確論，亦非本文所能處理，因此筆者不加以任何評斷，僅陳述與朝鮮史編修會相關過程。

會首席顧問東京帝國大學教授黑板勝美 (1874-1946) 卻以檀君、箕子係「神話人物」, 不該納入修史事業, 明確否定崔氏等人的意見, 因而引發朝鮮籍委員的不滿。編修會最後決定朝鮮史編纂範圍定為「新羅統一以前」、「新羅統一時代」、「高麗時代」、「朝鮮時代前期 (太祖至宣祖)」、「朝鮮時代中期 (光海君至英祖)」、「朝鮮時代後期 (正祖至甲午改革)」等 6 編。任教於京城帝國大學朝鮮史講座的今西龍等人都是主要編修人員或委員。⁴⁶ 對照京城帝國大學朝鮮史講座的講授範圍: 第一講座之課程以新羅史及考古學、金石學為主; 第二講座則以李朝時代為主, 旁及高麗時代、古代史, 與朝鮮史編纂的範疇是一致的。儘管朝鮮史之始從檀君朝鮮縮短至新羅時代, 但仍有將近二千年的歷史, 因此京城帝國大學朝鮮史學科得以設置兩個講座。相較之下, 臺北帝國大學南洋史講座之臺灣史課程僅只於十六、七世紀臺灣史, 單獨設置「臺灣史講座」的可能性當然就不高了。

四、師資

(一) 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之師資

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設有東洋史學、國史學、南洋史學 3 個專攻講座, 以及非專攻講座西洋史學・史學地理學與土俗學・人種學講座。東洋史學講座先後有藤田豐八 (1869-1929)、⁴⁷ 桑田六郎 (1894-1987)⁴⁸ 擔任講座教授, 以及助教

⁴⁶ 鄭圭永,〈京城帝國大学に見る〉,頁 185-192。

⁴⁷ 藤田豐八,號劍峰,日本德島縣人。1895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学漢文科,歷任東京專門學校、哲學館教職。1897年前往中國任教。1912年返回日本,致力於東西交通史之研究。1920年獲文學博士學位。1928年應聘為臺北帝國大學教授兼文政學部部長。1929年5月,藤田返回東京準備為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開授西域史特別講義,不幸因腎萎縮症於7月15日驟然病逝,在任僅1年餘。藤田是最早考證南宋樓鑰《攻媿集》中所述的「平湖」為澎湖者。主要著作有《東西交涉史の研究》、《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箋釋》、《島夷誌略校注》等。〈藤田豐八 (賞與; 危篤)〉,《昭和4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10,057冊17號文書,1929年7月15日;加藤繁、松田壽南,〈彙報:藤田博士逝く〉,《史學雜誌》40:4 (1929年8月),頁119-125;許雪姬總策畫,《臺灣歷史辭典》(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頁1336。

⁴⁸ 桑田六郎,1918年東京帝國大學東洋史學科畢業;1928年5月獲聘擔任臺北帝國大學東洋史講座講師,翌年7月原講座教授藤田豐八逝世,9月升任東洋史講座教授。1943年3月兼南方人文研究所所員,7月以〈三佛齊考及補考〉獲得東京帝國大學文學博士學位。戰後初期,為臺灣大學留用,曹永和曾於此時期旁聽桑田課程,開啟日後學術研究的契機。1948年底返回日本。〈桑田六郎 (東洋史學講座擔任ヲ命ス)〉,《昭和7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10,070冊22號文書,1932年4月

授青山公亮(1896-1980)、⁴⁹ 助手前嶋信次(1903-1980)⁵⁰ 等人。此外,1930-1931年間桑田赴海外研究考察期間,曾兩度聘任東京帝國大學榮譽教授市村瓊次郎來臺客座,講授兩宋思想史與中國古代史。國史學講座師資有講座教授中村喜代三(1897-?)、⁵¹ 助教授小葉田淳(1905-2001)。⁵² 至於「特色講座」南洋史學講座,其課程以十七世紀臺灣史學為中心,擴及華南、南洋史學之研究,任教師資先後有村上直次郎、岩生成一、箭內健次(1910-)等人,詳如附錄之表三。

村上直次郎,1892年入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史學科就讀。三年後1895年,也就是臺灣開始被日本殖民統治這一年,大學畢業,隨即進入大學院就讀,接受坪井九馬三及德籍史學家李斯的指導。村上的英語能力在同志社英學校、一高時,就已經是同輩間的佼佼者。在李斯、坪井的指導下,以其原有的英語能力為基礎延伸學習德、法,以及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拉丁等語言,奠定

4日;桑田六郎,〈桑田六郎年譜〉,收於桑田六郎,《南海東西交通史論考》(東京:汲古書院,1993),頁5-6;長岡新治郎,〈編集後記〉,收於桑田六郎,《南海東西交通史論考》,頁463-464;曹銘宗,《自學典範:臺灣史研究先驅曹永和》(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9),頁80-81。

⁴⁹ 青山公亮,1920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東洋史學科,1922年任松江高等學校教授。1931年4月任臺北帝國大學東洋史學科助教授,發表多篇日本與高麗關係史、中國元朝史論文。戰後返回日本,1948年任上智大學教授,翌年轉任明治大學教授,1963年以論文《日麗交涉史の研究》獲得明治大學文學博士學位。戰後活躍於日本朝鮮史學界,長期擔任朝鮮史研究會會長職務。〈青山公亮(任臺北帝國大學助教授;俸給;勤務)〉,《昭和6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10,064冊22號文書,1931年4月1日。朝鮮史研究會編,〈青山公亮博士略歴および朝鮮史關係著作目録〉,收於朝鮮史研究會編,《朝鮮史研究會論文集》(東京:朝鮮史研究會,1966),第2集,頁121-124。

⁵⁰ 前嶋信次,1928年東京帝國大學東洋史學科畢業,隨其師藤田豐八至臺北帝國大學任助手,負責書籍採購及整理工作,同時著手研究臺灣史與東西交通史。1933年轉任臺南第一中學校歷史科教諭,致力於臺南鄉土史研究。1940年返回日本,入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轉向中國回教史研究。1953年以伊斯蘭勢力消長相關研究獲得慶應大學文學博士。此外,亦長於醫學、藥學史之研究,被譽為「日本伊斯蘭研究之父」。矢島文夫,〈前嶋信次〉,收於江上波夫編,《東洋学の系譜》(東京:大修館書店,1994),第2集,頁246-255。

⁵¹ 中村喜代三,1923年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國史學科,隨即入大學院就讀,研究題目為〈日本近世文化之研究〉;1924-1928年任堺市市史編纂長;1929年4月自京都大學大學院退學,轉任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助教授;翌年4月升任國史學講座教授。〈中村喜代三(任臺北帝國大學教授;俸給;勤務)〉,《昭和5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10,059冊76號文書,1930年3月1日。

⁵² 小葉田淳,1928年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國史學科,任堺市市史編纂;1930年4月任臺北帝國大學講師,10月升任助教授;1930年代赴沖繩調查明清時期琉球王國對中國朝貢相關情形,抄回重要文書《歷代寶案》,1939年出版明代中琉朝貢貿易之著作《中世南島通交貿易史の研究》;1942年秋,受海軍特務部委託,1943年12月完成第一部《海南島史》。〈小葉田淳(任臺北帝國大學助教授;俸給;勤務)〉,《昭和5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10,062冊25號文書,1930年5月10日;小葉田淳,《海南島史》(海南:海軍特務部,1943);小葉田淳著、張迅齋譯,《海南島史》(臺北:學海出版社,1979);吳密察著、食野充宏譯,〈植民地大学とその戦後〉,頁309。

日後譯著、研究之能力。1896年5月22日，村上還是東京帝國大學大學院生時，就被拓殖務省聘為囑託，從事臺灣史的調查研究工作，村上在舊臺南府城附近的新港社發現以荷蘭文字拼寫之蕃語土地契約書，並將其發現的「蕃仔契」圖版交由總督府民政局學務部囑託語言學專家小川尚義，著手進行此一研究。村上將此種新發現的蕃語羅馬字土地契約書命名為「新港文書」，並將其初步研究的成果發表在《史學雜誌》上。⁵³ 1922年4月，臺灣第一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為了宣示臺灣治政進入新的階段，並宣揚日本在臺之統治實蹟，遂成立「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希望以三年時間搜集、編纂臺灣統治25年(1895-1919)之史料，並撰成日本統治時期歷史為主的「新臺灣史」。村上被聘為史料編纂事務囑託，主要負責搜集、調查荷蘭領臺時期事蹟。⁵⁴ 1928年4月，村上直次郎被聘為臺北帝國大學南洋史學講座教授。⁵⁵ 1929年兼任總督府史料編纂會編纂部長，完成了《巴達維亞城日誌》、《柯爾尼李斯·賴耶魯仙司令官日記》之日譯工作。村上擅長以荷、西史料研究臺灣史、南洋史，以及日本與南洋關係史、天主教史等。除了南洋史課程外，也負責教授一年級生史學概論課程。1930年，史學科增設西洋史學、地理學講座，由村上兼任講座教授，直到1935年他辭去臺北帝國大學教授職務，才由助教授菅原憲接任。村上直次郎以98歲高壽辭世，一生著作等身，臺灣研究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根據筆者統計其與臺灣有關之研究與譯著約有22種，按照文章的性質大致可分三類：1.與「新港文書」之發現、研究有關者，2.南洋史相關之研究，3.十六、七世紀臺灣史之研究與譯注，此類數目最多。⁵⁶

岩生成一，1925年3月東京帝國大學國史學科畢業。4月，隨即任東大史料編纂官補，在村上的指導下負責《大日本史料》第12編歐文材料的編纂工作。⁵⁷ 1927年7月，赴中國、香港、越南、泰國及荷領東印度考察三個月。1929年11月，任

⁵³ 村上直次郎此次發現的新港文書，合計41通，其中有8通附有漢文翻譯。以年代區別，雍正年間1通、乾隆年間35通、嘉慶年間5通。詳閱村上直次郎，〈臺灣新港社文書〉，《史學雜誌》8:7(1897年7月)，頁674-683。

⁵⁴ 〈村上直次郎(府史料編纂二關スル事務ヲ囑託ス)〉，《大正12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3,752冊38號文書，1923年7月28日。

⁵⁵ 〈村上直次郎(自今內地滯在中加俸本俸ノ十分ノ三ヲ給ス)〉，《昭和3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10,051冊57號文書，1928年5月17日。

⁵⁶ 有關村上直次郎的臺灣史研究業績，請參考葉碧苓，〈村上直次郎的臺灣史研究〉，《國史館學術集刊》17(2008年9月)，頁1-35。

⁵⁷ 金井圓，〈岩生成一先生を偲ぶ〉，《史學雜誌》97:6(1988年6月)，頁1123-1124。

臺北帝國大學助教授。⁵⁸ 岩生專長是南洋日本町、日本人活動的研究，擅長以荷、西語之東南亞文獻史料，從事十七世紀日本人移民南洋活動之研究。1935年9月底，村上辭去臺北帝國大學教授職務，其職務由岩生成一接替。⁵⁹ 1939年8月，岩生為蒐集南洋史學暨華僑關係資料，前往蘭印爪哇島進行調查研究。此次的調查成果成為臺北帝國大學開學紀念展覽會、歷史展覽會及校外人士蒞校參觀時，對外展示的重要展品。⁶⁰ 1941年4月，以其著作《南洋日本町の研究》一書獲得日本帝國學士院賞。⁶¹ 此外，岩生對於臺灣的研究除了荷治以前的豐臣秀吉、有馬晴信、村山等安等人的侵佔臺灣之研究外；荷治時期有〈三百年前臺灣砂糖與茶的輸出波斯〉、〈在臺灣的初期日本移民〉等研究，特別是〈明末日本僑寓支那人甲必丹李旦考〉一文，考訂鄭芝龍之故主究竟是顏思齊或李旦，更是引發學界討論。⁶²

箭內健次，生於福島縣西白河郡，為日本蒙古史專家箭內互（1875-1926）之次子，1934年東京帝國大學國史學科畢業，之後隨即進入大學院就讀，期間曾發表「關於日西交涉斷絕」的研究論著，不同於向來研究者從德川幕府封建制度確立的角度，而以日本商船在南洋通商貿易受歐洲人打壓來解釋日本鎖國政策之實施，展露其南洋史研究的實力。⁶³ 箭內專長以西班牙文獻進行菲律賓史的相關研究。⁶⁴ 1936年11月，任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南洋史學講座講師；1938年5月，改聘為助教授。⁶⁵ 1943年3月「南方人文研究所成立」，箭內與岩生都成為該所兼任所員，箭內負責菲律賓基督教史研究；岩生負責日本人南方移民發展史研究。⁶⁶

⁵⁸ 〈岩生成一（任臺北帝國大學助教授；俸給；勤務）〉，《昭和4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10,058冊40號文書，1929年11月1日。

⁵⁹ 〈岩生成一（任臺北帝國大學教授；敘高等官五等；本俸十二級俸下賜；文政學部勤務ヲ命ス；南洋史學講座擔任ヲ命ス；講座職務俸九百九十圓下賜）〉，《昭和11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10,085冊134號文書，1936年3月11日。

⁶⁰ 編者，〈彙報〉，收於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編，《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研究年報》（臺北：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1940），第6輯，頁267-268。

⁶¹ 岩生成一，《續南洋日本町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87），頁476-486。

⁶² 曹永和，〈臺灣荷據時代研究的回顧和展望〉，收於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0），頁319。

⁶³ 編者，〈彙報：國史大學院例會〉，《史學雜誌》47:8（1936年8月），頁1032-1033。

⁶⁴ 箭內健次，〈近世の外交〉，收於箭內健次，《新講大日本史第9卷：日本外交史》（東京：雄山閣，1941）。

⁶⁵ 〈箭內健次（任臺北帝國大學助教授；七等十二級；文政學部勤務；職務俸三百六十圓）〉，《昭和13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10,093冊182號文書，1938年5月27日。

⁶⁶ 南方人文研究所編，《南方人文研究所要覽》（臺北：南方人文研究所，1943），頁5-6。

（二）京城帝國大學史學科之師資

京城帝國大學史學科分為國史學科、東洋史學科、朝鮮史學科三個分支，各有兩個講座，⁶⁷ 講座數、編制皆為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的兩倍。以臺北帝國大學南洋史講座為例，臺灣史研究僅以十七世紀荷、西時期歷史夾帶於南洋史研究；而京城帝國大學朝鮮史則為 3 分科之一，研究範圍除了朝鮮史之外，尚擴及滿蒙史、日韓關係史，故能占有兩個講座。

京城帝國大學史學科國史學科兩個講座之講座教授分別為田保橋潔（1897-1945）、松本重彥（1887-?）。東洋史學科第一講座先後有大谷勝真（?-1942）、玉井是博（1897-1940）、松田壽男（1903-1982）等人任教，第二講座教授為鳥山喜一（1887-1959）。朝鮮史學科設有兩個講座，課程以朝鮮史學為中心，擴及滿蒙史學之研究，第一講座先後有今西龍（1875-1932）、藤田亮策（1892-1960）；第二講座先後有小田省吾（1871-1953）、末松保和等人任教，詳如表四。

今西龍，1903 年 7 月東京帝國大學史學科畢業，同年 9 月入大學院就讀，在坪井九馬三的指導下，轉以考古學的方法專攻朝鮮史研究。1906 年秋，大學院就讀期間，首次乘馬入朝鮮慶州考察寺廟、古墳；1907 年 8 月，於朝鮮南部的金海發現貝塚。1908 年 6 月，任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副手，負責管理考古學教室；1913 年 3 月，因內藤湖南之提拔升任史學科講師；同年 9 月赴朝鮮從事考古學的調查，於朝鮮北部平安南道龍岡縣發現「粘蟬縣神祠碑」。1916 年，升任京都帝國大學東洋史學研究室的教授，負責講授朝鮮史課程；同年起，同時受聘為朝鮮總督府囑託，從事朝鮮史編纂事業，直到 1932 年去世為止，都是該項編纂事業的中心人物。⁶⁸ 1922 年 6 月，以《朝鮮古史の研究》獲得京都帝國大學文學博士學位，係京都帝國大學第四位文學博士，也是日本第一位朝鮮史學博士。1926

⁶⁷ 國史學科兩講座分別成立於 1926、1928 年，東洋史學科兩講座分別成立於 1926、1927 年，朝鮮史學科兩講座則是 1926 年創校時即同時成立。鄭圭永，〈京城帝國大学に見る〉，頁 84。

⁶⁸ 1915 年 7 月，因中樞院提議由朝鮮總督府著手編纂「朝鮮半島史」；翌年 3 月，朝鮮總督府成立「朝鮮史編修會」，並聘任京都帝國大學教授三浦周行、今西龍與東京帝國大學教授黑板勝美 3 人為囑託，總責此項編修事業。此後陸續編修出版，直到 1938 年 3 月，全套 35 卷的《朝鮮史》（菊版、2 萬 4 千頁，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有一套影本）才全數出版完畢，先後任教於京城帝國大學朝鮮史學科的今西龍、小田省吾等 4 人，皆參與此項編修事業。鄭圭永，〈京城帝國大学に見る〉，頁 185-192。

年，京城帝國大學設立，由今西龍出任朝鮮史第一講座教授。此後，每年往來京都帝國大學與京城帝國大學講學。因其一生治學嚴謹，著作不肯輕易付梓，過世後才由藤田亮策、末松保和及學生田川孝三（1931年京城帝國大學朝鮮史學科畢業）等人整理刊行，計有《新羅史研究》、《百濟史研究》、《朝鮮史の栞》、《朝鮮古史の研究》、《高麗及李朝史研究》等。⁶⁹

藤田亮策，1918年7月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学史學科畢業，隨即任日本文部省維新史料編纂事務囑託；1922年3月，轉任朝鮮總督府古蹟調查委員（課長小田省吾），參與朝鮮南部古墳調查工作。此後，歷任朝鮮博物館協議委員、朝鮮總督府學務局博物館主任、朝鮮古蹟研究會幹事，直到二戰結束為止都參與朝鮮考古發掘、調查等工作。此外，亦同時參與朝鮮史編修事宜，1924年底任朝鮮總督府編修官，翌年改任朝鮮總督府朝鮮史編修會修史官。1926年，京城帝國大學設立，6月出任朝鮮史第一講座助教授，負責朝鮮考古學課程；1932年5月，今西龍去世後，7月接替為朝鮮史第一講座教授。1933-1936年，獲得帝國學士院研究獎勵金，從事「朝鮮及滿洲巨石墳墓之研究」。戰後返回日本，任教多所大學，並持續從事朝鮮史學相關研究。主要著作有《朝鮮古代文化》、《間島省古蹟調查報告》、《瀋陽狀啟》、《朝鮮考古學研究》、《朝鮮古文化綜鑑》、《朝鮮學論考》等。⁷⁰

小田省吾，1899年7月，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学史學科畢業。歷任長野縣師範學校教授、山口縣荻中學校教諭、德島縣師範學校校長、奈良縣畝傍中學校長、第一高等學校教授。1908年11月，轉任日韓合併前之韓國政府學部書記官，負責教科書編纂、審查等事宜。1910年，日韓合併，改任朝鮮總督府內務部學務局編輯課長。除了教科用圖書編纂事務外，也參與朝鮮史編修及朝鮮古蹟發掘調查工作。1913年，兼任京城專修學校校長。1918年，升任朝鮮總督府中樞院編纂課長，負責朝鮮半島史編纂事務；同年10月，赴滿洲、青島視察。1921年起，又兼任舊慣及制度調查委員、學務局古蹟調查課長。1922年9月，赴全羅南北道

⁶⁹ 田中俊明，〈今西龍〉，收於江上波夫編，《東洋学の系譜》，第2集，頁58-67。

⁷⁰ 藤田亮策，〈私の履歷書〉、〈略年譜〉，收於藤田亮策，《朝鮮學論考》（奈良：藤田先生記念事業會，1963），頁691-703；末松保和，〈藤田先生と私〉，收於末松保和，《末松保和朝鮮史著作集2：新羅の政治と社會》（東京：吉川弘文館，1995），下冊，頁253-256。

諸寺考察，發現高麗時代遺留之《大般涅槃經疏》殘缺本。1923年11月，任京城帝國大學創設委員會委員，與服部宇之吉（1867-1939，首任總長）、高橋亨（1878-1967，1926-1939年任朝鮮語學・朝鮮文學第一講座教授）、志賀潔（1871-1957，首任醫學部長）等一起負責規畫京城帝國大學的創校事宜。同年，小田結合有志於朝鮮史研究之學者、官員等，創設「朝鮮史學會」，出刊《朝鮮史講座》共計15號。1926年，京城帝國大學成立，由小田出任朝鮮史第二講座教授兼預科部長。1930年，又發起朝鮮研究團體「青丘學會」。1932年3月，自京城帝國大學退職，退而不休，繼續擔任客座教授1年；同年6月組織「朝鮮歷史地理學會」、創立私立淑明女子專門學校（今之淑明女子大學）。1933年起，參與朝鮮李朝實錄的編纂工作。主要著作有《朝鮮史大系》、《朝鮮半島の歴史》、《朝鮮支那文化の研究》、《朝鮮小史》、《辛未洪景來亂の研究》等。⁷¹

末松保和，1927年3月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國史學科畢業。同年5月，在東京帝國大學教授黑板勝美（1874-1946）的推薦下，任朝鮮總督府朝鮮史編修會囑託，協助稻葉岩吉（1876-1940）有關李氏朝鮮時代時期史的編纂事宜。翌年升任修史官補，協助今西龍有關新羅統一以前及新羅統一時代史的編修。小田省吾退休後，1933年4月，末松保和轉任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講師，1935年6月升任助教授，1939年5月起繼小田省吾之後，成為朝鮮史第二講座教授。1938年，曾至偽滿洲國、關東州、中國華北等地考察。戰後返回日本，歷任學習院大學教授，東京、九州、天理等大學講師，朝鮮學會副會長、東洋文庫研究員。1951年5月，以論文《新羅史の新問題》獲得東京大學文學博士學位。主要著作有《末松保和朝鮮史著作集》6冊。⁷²

臺北帝國大學的村上直次郎、岩生成一與京城帝國大學的箭內健次以及今西龍、小田省吾與藤田亮策、末松保和等7人皆出身東京帝國大學，承繼德國傳統之實證史學之風。村上、今西、小田、藤田等人係史學科專攻畢業；而岩生、箭內、末松等人則為國史科專攻畢業。巧合的是，7人皆非畢業於「東洋史」專攻。

⁷¹ 小田省吾，〈小田省吾略歷自記〉、〈小田省吾著作目錄〉，收於小田省吾，《辛未洪景來亂の研究》（京城：小田先生頌壽記念會，1934），頁1-10、1-4。

⁷² 末松保和，〈末松保和博士略年譜・著作目錄・講義題目〉，收於末松保和，《末松保和朝鮮史著作集6：朝鮮史と史料》（東京：吉川弘文館，1997），頁374-404。

在村上、今西、小田就讀的時代因為還沒有「東洋史」專攻，因此他們都可算是戰前日本學院體制培養出來的第一代東洋史研究學者；而岩生、箭內、末松 3 人因為係國史科專攻畢業，其研究的中心思想大多從日本對外關係的角度出發。例如，岩生畢生代表著作《南洋日本町の研究》即以日本人南方移民發展史為中心；箭內之研究則著重在日本與菲律賓、泰國等東南亞國家之關係史；而末松則對朝鮮上代關係史「任那日本史」用力頗多。上述 7 人在江上波夫主編之《東洋学の系譜》中列名的有今西龍；另外在日本東方學會會長神田信夫主編之《東方学回想》系列中，則有村上直次郎、藤田亮策、岩生成一 3 人名列其中。小田省吾自日韓合併之前即任職於統監府，直到 1945 年為止，一生最精華的時代都投入在朝鮮半島，被永島廣紀將其列為 1945 年以前日本學者中朝鮮史研究業績第一。⁷³而末松保和戰後持續投入朝鮮史研究，並勇於修正戰前個人之研究論點，著有《末松保和朝鮮史著作集》6 冊，業績不容小覷。

村上直次郎一生著作等身，但 1935 年回國後並未再繼續從事臺灣史的相關研究。惟，1966 年村上去世後，其高足中村孝志將村上在「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會」部長任內摘抄翻譯之荷西時期史料，增補詳細的註釋和附錄，並整理村上在「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會」時期未刊行的《巴達維亞城日誌》下卷，文後又附索引，於 1970 年至 1975 年由東京平凡社重新出版。⁷⁴ 岩生成一於二戰後曾短暫留任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南洋史學課程。回到日本後，1948 年任東京大學教授，1951 年獲文學博士學位。東京大學退休後，轉任法政大學任教。教學之餘持續從事日本人移民在東南亞的生活與活動之研究，1987 年出版《續南洋日本町の研究》一書。箭內健次戰後即返回日本，歷任外務省、文部省勤務，1950 年後歷任金澤大學、九州大學、東海大學、駒澤大學教授，從事日本鎖國前後對外關係史之研究。要之，村上等 3 人回去日本後都沒有再從事臺灣史相關研究。反觀任教於京

⁷³ 永島廣紀，〈日本における近現代日韓關係史研究〉，收於日韓歷史共同研究委員會編，《日韓歷史共同研究報告書：第 3 分科篇》（東京：日韓歷史共同研究委員會，2005），下卷，頁 204。

⁷⁴ 新的校注本第 2 冊附錄中，收有村上在編修《史料雜纂》第 1 卷時所翻譯的西班牙佔據基隆的相關資料、臺灣長官 Paulus Tradenius 給 Henrick Harrousee 的攻略基隆的西班牙駐軍的指令、Harrousee 的攻略報文、荷西的協定等荷蘭驅逐基隆西班牙勢力的資料、荷蘭在臺灣的傳教資料、Combes 書中所收錄的鄭成功諭呂宋書等珍貴的荷、西史料。另外，新的校注本第 3 冊附錄收有《史料雜纂》第 1 卷中有關「1650 年臺灣戶口調查表」的荷蘭文檔案的日譯等史料。村上直次郎譯、中村孝志校注，《バタヴィア城日誌》（東京：平凡社，1970、1972、1975），第 1、2、3 冊。

城帝國大學朝鮮史學科之 4 人，除今西龍逝於朝鮮史第一講座教授任內外，其餘的小田省吾、藤田亮策與末松保和等人，二戰後都持續從事朝鮮史的相關研究，並組成「朝鮮學會」與韓國史學界持續交流、往來，情形與村上等人大相逕庭。

五、學生修讀情形

（一）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的學生

臺北帝國大學成立後，原本史學科招生名額是預定南洋史、東洋史、國史專攻各 5 名，但招生情況遠不如預期。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招生不足的情況也不是特例，事實上戰前東京帝國大學、東北帝國大學等校的史學科就學率也都不高。⁷⁵ 目前可知，1928-1943 年間，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約有 61 名學生，其中臺籍學生僅有柯設偕（1900-1990，馬偕外孫）和張樑標 2 名。⁷⁶ 此外，除了柯設偕和張樑標之外，二戰末期另有 1 名臺籍學生張美惠進入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就讀。張氏原師事岩生成一，戰後岩生返回日本，改隨桑田六郎，撰寫〈關於東西洋考中的明代中暹交通〉為題之畢業論文，惟其畢業時已是 1947 年 7 月，屬於二戰後臺灣大學史學系第一屆的畢業生，因此本文未將張氏列入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畢業生之中。⁷⁷

截至 1942 年止，已知畢業生有 26 名，其中國史學專攻 7 名、東洋史學專攻 9 名、南洋史學專攻 10 名，南洋史學專攻之畢業生約占 38%。此外，根據 1943 年南洋史專攻畢業的田中則雄（1919-）回憶，國史學專攻畢業生尚有：御供田忠喜、大饗利正、小橋川亮、井上須巳次等 4 人；東洋史專攻畢業生尚有：清水鞏一、關恭彥等 2 人；南洋史專攻畢業生尚有：青野晃、西村兵部、樋田豐、星

⁷⁵ 岩生成一等，〈先學を語る、村上直次郎博士〉，頁 147-148。

⁷⁶ 陳偉智，〈文政學部：史學科簡介〉，《Academia》創刊號（1996 年 4 月），頁 85-88。

⁷⁷ 張美惠畢業後留校擔任助教，編入涂序瑄主持之「南洋史學研究室」，研究題目為亞洲天主教傳教史、臺灣史。〈史學系研究室主持人已配妥〉、〈文學院史學系成立六研究室〉，《國立臺灣大學校刊》9（1948 年 3 月 1 日），第 2、4 版；國立臺灣大學同學會，《會員名錄》（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同學會，1947），頁 26；歐素瑛，《傳承與創新》，頁 245。

出幸雄、長岡新治郎、阪野鎮雄、山中正、兒玉太刀男、田中則雄、富名腰尚武、藤原正義等 11 名。⁷⁸ 與 1942 年以前之 26 名加總計算，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畢業生則有 43 名，其中國史學專攻 11 名、東洋史學專攻 11 名、南洋史學專攻 21 名，南洋史學專攻之畢業生約占 49%，將近一半。目前已知之 1931-1942 年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畢業生修業年限與畢業論文題目，詳如表五。

根據表五顯示，南洋史學科 10 位畢業生中有 4 位（山村光敏、速水家彥、中村孝志、齋藤悌亮）的題目是與十七世紀臺灣史有關，他們都是曾經受教於村上的，其餘的則為華南、南洋史研究。其中，成就最高者當屬中村孝志。中村終其一生皆埋首於臺灣史的相關研究，主要著作有《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日本南進政策與臺灣》等，成果極為豐碩。此外，東洋史學、國史學科的學生也有幾位是以南洋史學有關的主題作為畢業論文。例如馬偕的外孫柯設階與原徹郎（1911-?），他們兩人也是在村上的指導下完成論文的。畢業後，柯設階回母校淡水中學任教；原徹郎進入東京「東亞研究所」，東南亞史的研究成果頗多。⁷⁹ 而 17 年間，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僅有 2 位臺籍學生，僅占全部學生的 3%，比例實在很低。柯設階與張樑標兩人雖然分屬東洋史學與南洋史學講座，但畢業論文主題皆屬臺灣史與南洋史領域。柯設階畢業後即返回淡水中學任教，1976 年曾發表〈淡水牛津學堂沿革〉一文，稱淡水為「詩美之鄉」，⁸⁰ 他同時也是研究淡水史

⁷⁸ 此項資料係 2008 年 11 月 1 日曹永和教授於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八十週年系慶講座」，講題：「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的研究」之演講內容，感謝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周婉窈教授及該系助教陳南之小姐協助照相攝影。1998 年 11 月，田中則雄以校友身分到臺灣參加國立臺灣大學七十週年校慶，因而結識曹永和教授，田中除填補許多《Academia：臺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上空白之處外，2000 年 9 月捐贈收藏書刊雜誌 780 種給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內容多為二戰後日本出版之東南亞史研究之相關資料，參見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田中則雄捐書清單」，網址：http://www.lib.ntu.edu.tw/CA/rules/gift_3.htm，下載日期：2009 年 6 月 21 日。此外，田中也將其個人著作贈送給曹永和教授，此書曹教授曾於演講中拿出傳閱，但筆者查閱國內各大圖書館似乎沒有此書之典藏，僅見於日本國會圖書館典藏一本。參見田中則雄，《醬油から世界を見る：野田を中心とした東葛飾地方の対外関係史と醤油》（流山：崙書房，1999）。

⁷⁹ 原徹郎，《南方文化講座》（東京：三省堂，1943、1944），第 1、3 冊；Eijkman A.J.、Stapel F. W. 著，村上直次郎、原徹郎譯，《蘭領印度史》（東京：東亞研究所，1942）；參考西村朝日太郎：〈學界のヨブ・馬淵東一外傳〉，收於馬淵東一先生古稀記念論文集編集委員會編，《馬淵東一先生古稀記念：社会人類学の諸問題》（東京：第一書房，1986），頁 486。

⁸⁰ 柯設階，〈淡水牛津學堂沿革〉，《臺灣風物》26: 2（1976 年 6 月），頁 18-19。

的開山鼻祖。而張樑標畢業後曾短暫任職於臺灣總督府，隨後離職赴泰國經商，戰後初期進入臺灣省編譯館臺灣組從事日治時期臺灣研究成果中文翻譯工作。⁸¹ 1947年5月，臺灣省編譯館裁撤後，張氏轉入臺灣省農林廳任主計專員。⁸²

此外，值得附帶一提的是，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僅有2位臺籍學生的情形也讓任教時間最久的岩生成一深感遺憾。因此，1950年代末期當時任臺灣大學圖書館員的曹永和，將其發表之〈明代臺灣漁業誌略〉、〈荷蘭與西班牙佔據時期的臺灣〉等論文寄給二戰後回到日本東京大學任教的岩生時，岩生馬上給曹永和回信，對這位素未謀面、擔任圖書館員的臺灣人，給予讚美和鼓勵，並且親自來臺幫助曹氏爭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獎學金赴日研究的機會。⁸³ 而這段頗為特殊的師生緣，不僅彌補了戰前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臺籍畢業生無人持續從事臺灣史研究此一令人遺憾的現象，也為戰後臺灣史的研究與開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二）京城帝國大學史學科的學生

1926-1942年間，先後入京城帝國大學史學科就讀者有121名，其中朝鮮籍40名，大約占1/3。已知畢業生91名，其中朝鮮籍30名，也大約占1/3。根據1940年之京城帝國大學一覽所載，截至1940年止，京城帝國大學共有78名畢業生。其中，除了5名專攻科不詳外，專攻國史學科者有16名，全為日籍學生；專攻東洋史學科者32名，其中朝鮮籍15名、日籍17名；專攻朝鮮史學科者25名，其中朝鮮籍12名、日籍13名。1929-1942年京城帝國大學史學科學生就讀情形，詳如表六。

根據表六資料顯示京城帝國大學史學科91名畢業生中，僅有4名（3%）之修業年限超過3年。這與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43名畢業生，就有11名（26%）修業年限超過3年，相較之下，京城帝國大學的畢業門檻似乎較低。京城帝國大

⁸¹ 國分直一、張樑標譯，《臺北盆地之農家》；池田敏雄、張樑標譯，《臺灣民俗研究》（臺北：臺灣省編譯館，1947）。另有1947年《臺灣學報》第1期，金關丈夫、張樑標譯，〈射人〉；國分直一、張樑標譯，〈臺灣先史時代鞋形石器攷〉；青木文一郎、張樑標譯，〈鼠族驅逐論〉；池田敏雄、張樑標譯，〈福建系臺灣人的產育習俗〉。參考黃英哲，〈戰後初期臺灣之臺灣研究的展開：一個歷史斷裂中的延續〉，《臺灣文學研究集刊》2（2006年11月），頁114、119-121。

⁸² 國立臺灣大學同學會，《會員名錄》，頁5。

⁸³ 曹銘宗，《自學典範：臺灣史研究先驅曹永和》，頁84-91。

學史學科沒有朝鮮籍學生就讀國史學科研究日本史。巧合的是，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的唯一臺籍學生，也沒有人選擇專攻國史學科。而這樣的現象除了「民族主義」情感因素外，或許也和研究領域的熟悉度有關。畢竟對臺灣學生與朝鮮學生而言，日本史在當時雖是「國史」，但其性質終究還是「外國史」。

末松保和二戰後曾回憶，在他任教京城帝國大學的十餘年間，進入朝鮮史學科就讀的學生人數並不多，屬於他負責的朝鮮史學第二講座的朝鮮籍學生有 9 名。末松指導的 9 名朝鮮籍學生中，有 5 名的籍貫為「在北」（今之北韓地區）者，其中又以 1937-1940 年間就讀之金錫亨、朴時亨兩人較為優秀。兩人的畢業論文題目分別為：〈李朝初期に於ける兵制の研究〉、〈李朝初期の土地制度一斑〉。1945 年後，金、朴二人活躍於韓國歷史學界，並有多篇論文被翻譯成日文刊行。⁸⁴ 最特別的是，金錫亨《朝鮮封建時代農民の階級構成》一書係由其師末松保和與李達憲共同翻譯成日文，這種由老師翻譯學生論文的情形，可謂極其少見。⁸⁵ 另外，1932-1935 年間就讀之柳洪烈，畢業論文主題是李朝史，戰後曾經擔任韓國成均館大學校長。1938-1941 年間就讀之金廷鶴，畢業論文是以考古學為主題，戰後也持續於韓國考古相關研究。⁸⁶

1926-1942 年間，京城帝國大學史學科朝鮮籍學生約占全部學生的 1/3；巧合的是，同時段該校全部朝鮮籍畢業生有 582 名，日籍畢業生有 1,128 名，朝鮮籍畢業生占全部畢業生的 34%，大約也是 1/3。⁸⁷ 相較之下，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 17 年間僅有 2 名臺籍學生；而 1928-1942 年間，臺北帝國大學畢業之臺籍生有 154 名，日籍畢業生有 587 名，臺籍畢業生占全部畢業生的 21%。⁸⁸ 換言之，不僅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臺籍生的比例遠低於京城帝國大學史學科朝鮮籍學生，就

⁸⁴ 濱田耕策，〈解說：末松保和先生と高麗・朝鮮史の研究〉，收於末松保和，《末松保和朝鮮史著作集 5：高麗朝史と朝鮮朝史》（東京：吉川弘文館，1996），頁 362-363。

⁸⁵ 金錫亨著，末松保和、李達憲譯，《朝鮮封建時代農民の階級構成》（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60）。

⁸⁶ 桑田六郎等，〈先學を語る 藤田亮策先生〉，收於財団法人東方学会編，《東方學回想 V：先學を語る（4）》（東京：刀水書房，2000），頁 52。

⁸⁷ 馬越徹，〈韓国近代大学の成立と展開：大学モデルの伝播研究〉（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5），頁 134-135。

⁸⁸ 鄭麗玲，〈日本殖民地高等教育政策之轉折與發展：以京城帝國大學與臺北帝國大學之設立為例〉，《臺灣風物》51:2（2001 年 6 月），頁 133-134。

連臺北帝國大學臺籍生總數的比例也低於京城帝國大學朝鮮籍學生總數。然而，臺北帝國大學臺籍學生就讀率偏低的情形並不僅止於史學科，同為文政學部的文學科也是如此。17年間，文學科也只有陳欽鋁、田大熊、吳守禮、魏根宣、林啟東、黃得時、林龍標、林素琴等8名畢業生。⁸⁹ 相較於史學科與文學科，同為文政學部的政學科因為出路較佳，可參加司法科或行政科高等考試，進入司法界或政界就職，臺籍學生就讀意願較高，17年間約有40名的畢業生。而可以習得專業技術的理農學部與醫學部，就讀率則又更高一些。⁹⁰ 此外，除了就職較為困難的因素外，比起臺北帝國大學，臺灣學生及其家長更憧憬於日本內地的大學應該也是主要因素之一。⁹¹

根據吳文星教授的研究，日治時期臺籍人士赴日留學者多達20萬人，其中大專畢業生約6萬餘人，其餘為中學或職業學校等畢業生。顯然的，留日受過高等教育者遠多於臺灣島內殖民精英教育設施所培養的。留日大專生中以修習醫、法、商及經濟等科的學生占多數，⁹² 這樣的分布比率與就讀臺北帝國大學的臺籍學生是類似的。此外，根據許雪姬教授的研究，日治五十年間留日之臺籍學生中就讀史學科者也僅有2人，分別為陳華宗（1903-1968）與陳荊和（1917-1995）。⁹³ 陳華宗，臺南學甲人，自幼赴日本留學，1931年3月日本立正大學史學科畢業，留校擔任史學研究室副手，而後短暫擔任神奈川縣中原高等女學校教諭。翌年7月辭職歸臺，除協助家業外，也為研究臺灣史而奔走全臺，⁹⁴ 但似乎沒有留下相關史學著作。陳荊和，臺中婦產科醫生陳茂堤（1893-?）的長子，同樣也是自幼即留學日本，1942年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東洋史學專攻畢業，專長越南史及東南亞華僑史；1943-1945年進入越南河內的法國遠東學院進修東南亞史與越南語，娶北越貴族女子為妻。日治末期任臺北帝國大學助手，戰後留任臺灣大學歷史系講

⁸⁹ 國立臺灣大學同學會，《會員名錄》，頁5-6；鄭麗玲，〈帝國大學在殖民地的建立與發展：以臺北帝國大學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頁202。

⁹⁰ 國立臺灣大學同學會，《會員名錄》，頁6-9；鄭麗玲，〈帝國大學在殖民地的建立與發展〉，頁202-204；陳昭如，〈初探臺北帝國大學政學科的法學教育與法學研究〉，《Academia》2（1997年5月），頁41-62。

⁹¹ 〈沈滯的臺灣學界！〉，《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2月7日，第7版。

⁹²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頁83-164。

⁹³ 許雪姬，〈楊雲萍教授與臺灣史研究〉，頁6。

⁹⁴ 臺灣新民報，《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7），昭和12年版，頁245；太田肥洲編，《新臺灣を支配する人物と産業史》（臺北：臺灣評論社，1940），頁444。

師(1946.12-1950.8)、副教授(1950-1960),1954-1955年赴巴黎大學高級中國研究所從事遠東各國近代史研究,1959年赴越南任順化大學越南史料編譯委員會主席,兩年後正式辭去國立臺灣大學教職,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期間負責南洋史概說等課程。1963年香港中文大學成立,轉任該校歷史系高級講師、教授,講授東南亞史、日本史,期間兼任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1966年獲慶應義塾大學文學博士學位,而他可能是臺籍人士第一位獲得日本史學博士者。1981年退休,轉任日本創價大學。陳氏一生勤於著述,分別以中、日、英、越南文發表越南史、華僑史論著多達七十餘種。⁹⁵要之,日治時期大學畢業之臺籍人士選擇就讀史學科者之比例都是遠低於醫學、理農、法商等科目者,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並非特例。

六、結論

戰前,日本先後成立了九所帝國大學,分別為東京、京都、東北、九州、北海道、京城、臺北、大阪、名古屋。其中,1926年成立之京城帝國大學,以及1928年成立之臺北帝國大學,分別位於日本兩個主要殖民地朝鮮京城與臺灣臺北,其成立之背景與屬性有別於日本本國7所帝國大學。為配合殖民地統治的需要,臺北帝國大學與京城帝國大學的設校重點不同,而其史學科的課程設計與師資聘任,也配合此一「因地制宜」的設校目的,分別側重南洋史學與朝鮮史學。從史學科3分科之名稱與內容來看,日本本國的帝國大學之3分科為國史、西洋史學、東洋史學,而殖民地朝鮮之京城帝國大學則配合日本「北進」滿蒙、中國大陸的政策,刪去西洋史學專攻,改設朝鮮史學專攻,於一般之東洋史學研究外,偏重朝鮮史研究,並延伸擴展至滿蒙史。至於殖民地臺灣之臺北帝國大學則配合日本「南進」華南、南洋的政策,刪去西洋史學專攻,改設南洋史學專攻,於一般之東洋史學研究外,著力於十六、七世紀臺灣史之研究,並延伸擴展至南洋史。

⁹⁵ 許雪姬,〈楊雲萍教授與臺灣史研究〉,頁6;歐素瑛,《傳承與創新》,頁237、239;周佳榮,〈陳荊和教授著述目錄〉,《當代史學》4:4(2001年12月),網址:<http://www/hkbu.edu.hk/~sosc1/hist/index.html>,下載日期:2009年7月30日。

要之，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南洋史學講座之設置，即為研究、教授以臺灣為中心之華南、南洋史學。村上直次郎出任講座教授，不僅教學嚴謹、扎實，研究成果亦頗為豐碩。繼任之岩生成一、箭內健次，亦遵循村上腳步，兢兢業業。惟上述 3 人回到日本後都未再從事臺灣史的相關研究。京城帝國大學史學科朝鮮史學科之設置，則為研究、教授以朝鮮半島為中心之滿鮮、日韓、中韓關係史學。初期由今西龍和小田省吾出任講座教授，1933 年起由藤田亮策、末松保和繼任，4 人皆朝鮮史著作等身。除了今西龍逝於任內外，其餘 3 人戰後皆持續從事朝鮮史研究，甚至結合日本學界之朝鮮研究學者，共同組成「朝鮮學會」。上述 7 人皆出身東京帝國大學，承繼實證史學之風。惟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的講座設置、師資聘任、學生數都少於京城帝國大學史學科。亦即臺北帝國大學南洋史學僅有 1 講座，而京城帝國大學朝鮮史學科有 2 講座；先後任教臺北帝國大學南洋史學講座的師資有 3 人，而京城帝國大學朝鮮史學講座有 4 人。至於兩校史學科學生人數更是相差懸殊，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 17 年間僅有 61 名學生（臺籍 2 名）；確知的畢業生僅有 43 名（臺籍 2 名）。而京城帝國大學史學科到 1942 年止已有多達 121 名學生（朝鮮籍 40 名）；確知之畢業生也有 91 名學生（朝鮮籍 30 名）。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 2 名畢業生畢業後並未持續從事史學研究，相較之下，京城帝國大學史學科畢業之朝鮮籍學生則有多人持續從事朝鮮史研究，並有豐碩的成果。

戰後，臺灣因國民黨政府來臺，以回復中國文化為主要政策，「去日本化/中國化」的結果，日治時期留下來的的荷、西時期臺灣史研究轉而成為中國史研究的附庸，南洋史研究的傳統則幾乎完全消失，臺灣大學歷史系轉以中國研究為主，⁹⁶幾乎是漠視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所遺留的學術研究遺產。直到 1990 年代前後「本土意識」出現，才開始又試著跟世界接軌，重視臺灣史、海洋史的相關研究。⁹⁷而戰後韓國的史學研究承繼戰前 3 分科制度之遺緒，最初亦立足於實證的研究方法，韓國史、韓中關係史乃至於中國史研究量多質高。1960 年代起年輕學者提倡「民

⁹⁶ 曾士榮，〈從「臺北帝國大學」到「臺灣大學」：戰後文化重編之個案研究（1945-1950）〉《Academia：臺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2（1997 年 5 月），頁 5。

⁹⁷ 曹永和，〈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的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八十週年系慶講座」演講紀要，2008 年 11 月 1 日，網址：<http://tw.myblog.yahoo.com/jw!uduCo2SGHRYWizLEAu0T/article?mid=358&prev=-1&next=351>，下載日期：2009 年 4 月 10 日。

族史觀」、批判「殖民地史觀」的呼聲出現，以異於中國大陸、日本歷史學的觀點，重新解釋韓中、韓日關係史的著作逐漸出現。近年來又有白永瑞等主張以「東亞」為整體，致力於中、日、韓「共通教科書」的編輯，並質疑大學歷史系3分科制度。然而，誠如周婉窈教授在2008年4月日本朝日新聞社邀請「為了歷史和解」研討會上發表之意見，認為2005年出版之《開拓未來的歷史：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一書「共通」的範圍應該加入臺灣，並建議各國歷史學家嘗試以東亞海洋史的角度思考東亞共通歷史，這樣可以化解「邊緣和中心」的歷史緊張，有助於歷史和解。⁹⁸ 重新檢討戰前日本殖民時期這段歷史，是日本、韓國與臺灣史學界的重要課題，從「比較」的角度出發可以看出其中的異同，並有助於相互之間的「理解」，這也是小文撰寫的初衷。

⁹⁸ 周婉窈，〈中日韓共通教科書範圍應擴及臺灣〉，《大紀元》，2008年4月19日。網址：<http://www.epochtimes.com/b5/8/4/19/n2088210.htm>，下載日期：2009年7月28日。

附錄

表一：臺北帝國大學南洋史學相關課程一覽表

年度	課程名稱及內容	單位數	授課者	備註
1929	南洋史概說	2	村上	
	日本洋學史及び和蘭語	4	村上	
1930	南洋史概說	2	村上	
	西班牙語	2	村上	選修
	和蘭語	1	村上	選修
1931	日本と南洋との歴史的關係	2	村上	
	南洋史講讀	2	村上	
	和蘭語	1	村上	選修
	和蘭語初步	1	村上	選修
1932	南洋史概說	2	村上	
	南洋史講讀及び演習 (Compendio de la Historia Universal)	2	村上	
	西班牙語初步	1	村上	選修
	十七世紀に於ける日本と安南との交渉	2	岩生	
	南洋史講讀及び演習 (Buch : 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en Quinam)	2	岩生	
1933	歐洲人の南洋發展	2	村上	
	南洋史講讀及び演習 (Alvarez : Formosa Geographica de Historicamente Considerada)	2	村上	
	南洋史特殊講義 (日暹交渉史)	2	岩生	
	和蘭語初步	2	岩生	選修
1934	南洋史概說	4	村上	
	南洋史特殊講義 (日暹交渉史：接續前學年)	2	岩生	
	南洋史講讀 (J. Montersy Vidal : Historia de Filipinas)	2	村上	
	西班牙語初步 (New First Spanish Book)	2	村上	選修
	南洋史講讀及び演習 (De Jong : Overzicht der betrekkingen van de Nederlandsch Oost-Indische Compagnie met Siam)	2	岩生	
1935	南洋史概說	2	村上	上學期
	南洋史概說	2	岩生	下學期
	南洋史特殊講義 (臺灣史)	2	村上	
	南洋史特殊講義 (蘭領東印度近代史)	2	岩生	
	南洋史講讀及び演習 (Hoetink : So Bing Kong 蘇鳴崗, Het eerste hoofd der chineezen te Batavia)	2	岩生	
	和蘭語初步	2	岩生	選修
1936	南洋史特殊講義 (南洋關係史籍解題)	2	岩生	
	南洋史特殊講義 (近代暹羅外國關係史)	2	岩生	
	南洋史講讀及び演習 (W. Carelse : Indië vroeger en nu)	2	岩生	

1937	南洋史概説	2	岩生	
	南洋史特殊講義（蘭印に於ける日本人）	2	岩生	
	和蘭語	2	岩生	
	南洋史特殊講義（日比交渉史）	2	箭内	
1938	南洋史演習（西班牙語）	2	箭内	
	南洋史特殊講義（近代臺灣史の諸問題）	2	岩生	
	南洋史特殊講義（比島初期特殊關係）	2	箭内	
	南洋史講讀及び演習（蘭領東印度史）	2	岩生	
1939	西班牙語初歩	2	箭内	選修
	南洋史概説	2	岩生	
	南洋史特殊講義（近代南洋華僑史）	2	岩生	
	南洋史特殊講義（比島初期外國關係）	2	箭内	
	南洋史講讀及び演習（蘭印華僑史）	2	岩生	
1940	南洋史講讀及び演習（Jordanay Morera : La inmigración Chinas en Filipinas）	2	箭内	
	南洋史概説	2	岩生	
	南洋史特殊講義（近世臺灣史・特に鄭氏の活動を中心として）	2	岩生	
	南洋史講讀及び演習（蘭印華僑史）	2	岩生	
	南洋史特殊講義（比島諸産業の發達）	2	箭内	
1941	南洋史講讀（Avira Giron : Relacion del Reino de Nippon）	2	箭内	
	南洋史概説	2	岩生	
	南洋史特殊講義（近世臺灣史・特に鄭氏の活動を中心として：接續前學年）	2	岩生	
	南洋史講讀及び演習（バタビヤ文書館文書の研究）	2	岩生	
	南洋史特殊講義（エンコミエンダ制度史）	2	箭内	
	南洋史講讀及び演習（十六・七世紀の比島社會）	2	箭内	
	和蘭語初歩	4	岩生	選修

村上＝村上直次郎、岩生＝岩生成一、箭内＝箭内健次

資料來源：〈彙報〉，《史學科研究年報》（臺北：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1934），第1輯，頁451-454；〈彙報〉，《史學科研究年報》（臺北：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1935），第2輯，頁421；〈彙報〉，《史學科研究年報》（臺北：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1936），第3輯，頁374；〈彙報〉，《史學科研究年報》（臺北：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1937），第4輯，頁565；〈彙報〉，《史學科研究年報》（臺北：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1938），第5輯，頁431-432；〈彙報〉，《史學科研究年報》（臺北：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1940），第6輯，頁267；〈彙報〉，《史學科研究年報》（臺北：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1942），第7輯，頁251-252。

表二：1933-1944 年間末松保和開設之朝鮮史學相關課程

年度	課程名稱及內容	單位數
1933	朝鮮史學普通講義 (朝鮮史學史)	2
1934	朝鮮史學特殊講義 (朝鮮歷史地理)	2
1935	朝鮮史學普通講義 (新羅王朝史)	2
	朝鮮史學特殊講義 (朝鮮歷史地理：接續前學年)	2
1936	朝鮮史學普通講義 (高麗時代史)	2
	朝鮮史學演習 (海東諸國記)	2
1937	朝鮮史學普通講義 (李氏朝鮮時代史)	2
	朝鮮史學概說	1
1938	朝鮮史學概說	1
	朝鮮史學演習	2
1939	朝鮮史學普通講義 (李氏朝鮮と明との關係)	2
	朝鮮史學演習 (黨議通略)	2
1940	朝鮮史學概說	1
	朝鮮史學普通講義 (朝鮮時代の諸問題)	2
	朝鮮史學演習	2
1941	朝鮮史學普通講義 (李氏朝鮮時代史)	2
	朝鮮史學演習 (小華外史)	2
1942	朝鮮史學概說	1
	朝鮮史學演習 (經國大典)	2
1943	朝鮮史學特殊講義 (朝鮮史籍解題)	2
	朝鮮史學演習 (經國大典：接續前學年)	2
1944	朝鮮史學概說	1
	朝鮮史學普通講義 (日鮮關係：上代、任那史)	2

資料來源：濱田耕策，〈解說：末松保和先生と高麗・朝鮮史の研究〉，《末松保和朝鮮史著作集 5：高麗朝史と朝鮮朝史》，頁 362；〈末松保和博士略年譜・著作目錄・講義題目〉，《末松保和朝鮮史著作集 6：朝鮮史と史料》，頁 405；京城帝國大學編，《京城帝國大學一覽》，昭和 12 年，頁 72-73。

表三：臺北帝國大學南洋史學講座師資一覽表

	1928年	1929年	1930年	1931年	1932年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1936年
教授		村上	村上	村上	村上	村上	村上	村上 (9月止)	岩生 (3月起)
助教授		岩生	岩生	岩生	岩生	岩生	岩生	岩生	
講師									箭內 (11月起)
	1937年	1938年	1939年	1940年	1941年	1942年	1943年	1944年	1945年
教授	岩生	岩生	岩生	岩生	岩生	岩生	岩生	岩生	岩生
助教授		箭內 (5月起)	箭內	箭內	箭內	箭內	箭內	箭內	箭內
講師	箭內								

村上＝村上直次郎、岩生＝岩生成一、箭內＝箭內健次

附註：根據下述資料筆者列出村上直次郎擔任講座教授至1935年9月，1936年3月起才由岩生成一接任；箭內健次自1936年11月任南洋史學講座講師，1938年5月起才升任助教授，與吳密察〈植民地大學とその戦後〉一文之表1「文政學部史學科における講座と教官」，列出村上直次郎擔任講座教授至1933年，1934年起即由岩生成一接任；箭內健次自1935年任南洋史學講座講師，1936年起升任助教授，與本表所列有所出入。參見吳密察著，食野充宏譯，〈植民地大學とその戦後〉，吳密察等編，《記憶する臺灣：帝國との相剋》，頁309。

資料來源：〈村上直次郎（任臺北帝國大學教授；俸給）〉，《昭和3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10051冊21號文書，1928年3月27日；〈村上直次郎（年功加俸六百円下賜；退官；賞與）〉，《昭和10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10083冊123號文書，1935年9月26日；〈岩生成一（任臺北帝國大學助教授；俸給；勤務）〉，《昭和4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10058冊40號文書，1929年11月1日；〈岩生成一（任臺北帝國大學教授；敘高等官五等；本俸十二級俸下賜；文政學部勤務ヲ命ス；南洋史學講座擔任ヲ命ス；講座職務俸九百九十圓下賜）〉，《昭和11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10085冊134號文書，1936年3月11日；〈箭內健次（任臺北帝國大學助教授；七等十二級；文政學部勤務；職務俸三百六十円）〉，《昭和13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10093冊182號文書，1938年5月27日。

表四：京城帝國大學朝鮮史學科師資一覽表

4-1：朝鮮史學第一講座

	1926年	1927年	1928年	1929年	1930年	1931年	1932年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教授	今西	今西	今西	今西	今西	今西	今西 (5月止)	藤田	藤田	藤田
助教授	藤田									
講師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1939年	1940年	1941年	1942年	1943年	1944年	1945年
教授	藤田	藤田	藤田	藤田						
助教授										
講師										

今西＝今西龍、藤田＝藤田亮策

資料來源：田中俊明，〈今西龍〉，江上波夫編，〈東洋学の系譜〉，第2集，頁58-67；藤田亮策，〈私の履歷書〉、〈略年譜〉，收於藤田亮策，〈朝鮮學論考〉，頁691-703。

4-2：朝鮮史學第二講座

	1926年	1927年	1928年	1929年	1930年	1931年	1932年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教授	小田	小田	小田	小田	小田	小田	小田	小田 (客座)		
助教授										末松 (6月起)
講師								末松 (4月起)	末松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1939年	1940年	1941年	1942年	1943年	1944年	1945年
教授				末松 (5月起)	末松	末松	末松	末松	末松	末松
助教授	末松	末松	末松							
講師										

小田＝小田省吾、末松＝末松保和

資料來源：小田省吾，〈小田省吾略歷自記〉、〈小田省吾著作目錄〉，收於小田省吾，〈辛未洪景來亂の研究〉，頁1-10、1-4；末松保和博士略年譜・著作目錄・講義題目，收於末松保和，〈末松保和朝鮮史著作集6：朝鮮史と史料〉，頁374-404。

表五：1931-1942年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畢業生一覽表

修業年限	學生姓名	畢業論文	專攻科
1928-1931	柯設借	臺灣の名稱の歴史的並に地理的考察及び古代漢民族の臺灣に關する知識の變遷	東洋史
1928-1931	馬淵東一	支那古代に於ける片系と雙系	東洋史
1928-1932	中治起夫	徳川幕府の檢地	國史
1928-1932	大山綱武	日本都市經濟の研究	國史
1928-1932	波田野丈夫	景教名稱變遷考	東洋史
1928-1932	古屋次雄	第十九世紀初葉に於ける英支貿易	東洋史
1928-1932	松本盛長	四書に見える人格思想	東洋史
1928-1932	鈴木謹一	王安石の新法に付て	東洋史
1929-1933	佐渡理三郎	宋代の都市研究	東洋史
1930-1933	張樑標	第十六七世紀に於ける南支と南洋の歴史的關係	南洋史
1930-1933	淵協英雄	佔領初期にイスパニヤ(西班牙)の比島統治	南洋史
1930-1933	山村光敏	十七世紀に於ける臺灣經由の南洋貿易	南洋史
1930-1934	郷原正雄	十六七世紀に於ける呂宋島の日本人	南洋史
1931-1934	齋藤和太郎	教派神道三派の發生と其發達	國史
1932-1935	原徹郎	十六、七世紀に於ける支那と比律賓の關係	東洋史
1931-1935	速水家彦	鄭成功の臺灣攻略と其後の對和蘭人交渉	南洋史
1932-1935	中村孝志	臺灣に於ける西、蘭兩國人の教化事業	南洋史
1934-1937	鈴木猛雄	享保時代の奢侈禁令	國史
1933-1937	齋藤悌亮	鄭成功の臺灣攻略	南洋史
1935-1938	少名子正義	比律賓に於ける基督教の傳道事業に就いて	南洋史
1936-1939	中澤孝一郎	徳川幕府の參觀交替政策	國史
1937-1940	江本傳	十六・七世紀を中心としたる比律賓に就いて	南洋史
1938-1941	當摩義春	比律賓革命史	南洋史
1938-1942	松茂良興利	琉清通交貿易史の研究	國史
1939-1942	高添多喜男	清朝に於ける臺灣の荒政に就て	國史
1939-1942	高索辰正	十七・八世紀に於ける蘭支通商關係	東洋史

資料來源：〈彙報〉，《史學科研究年報》(臺北：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1934年)，第1輯，頁460-461。
 〈彙報〉，《史學科研究年報》(臺北：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1935年)，第2輯，頁425。
 〈彙報〉，《史學科研究年報》(臺北：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1937年)，第4輯，頁582。
 〈彙報〉，《史學科研究年報》(臺北：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1938年)，第5輯，頁433。
 〈彙報〉，《史學科研究年報》(臺北：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1940年)，第6輯，頁268。
 〈彙報〉，《史學科研究年報》(臺北：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1942年)，第7輯，頁253。
 陳偉智：〈文政學部：史學科簡介〉，《Academia：臺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創刊號(1996年4月)，頁85-89。

表六：1929-1942 年京城帝國大學史學科學生一覽表

畢業年月	朝鮮籍學生	日本籍學生	人數(朝/日/小計)
1929年3月	金昌鈞(朝)、申奭鎬(朝)	佐久間教洞(朝)、西健介(朝)、山口正之(朝)	2/ 3/ 5
1930年3月	尹珣均(朝)、成樂緒(朝)	小川勝男(東)、宮崎五十騎(東)	2/ 2/ 4
1931年3月	梁柱華(朝)、嚴武鉉(東)	伊藤勝嘉(朝)、江見一二(朝)、田川孝三(朝)、高橋一郎(東)、三好嚴一郎(東)	2/ 5/ 7
1932年3月	李繼甲(朝)、李周衡(朝)、李源鶴(東)、金鍾武(東)	犬飼俊三(朝)、松尾元治(朝)、森田芳夫(朝)、笠岡幹吾	4/ 4/ 8
1933年3月	蔡奎鐸(東)	稻光榮一(國)*、中岡積(國)*、竹下暉彥(東)、兵頭正(國)、宮崎信雄(東)、土居山洋	1/ 6/ 7
1934年3月	金聲均(東)、吳震泳(東)、李興鍾(東)	末永隆定(國)*、重吉万次(朝)、長島多助(東)	3/ 3/ 6
1935年3月	柳洪烈(朝)、徐廷德(東)、李昌業(東)、蔡義順(東)	江田忠(東)、荻野滿福(東)、大山祝三(國)、瀧澤朝男(東)、筒井滿志(東)、山住左武郎(東)、佐川順一	4/ 7/ 11
1936年3月	李明遠(東)	井上融(國)、小幡信一郎(東)、龜田敬二(朝)、土居山洋(國)、中井英雄(國)、平間武弑(朝)、稅田利秋	1/ 7/ 8
1937年3月	尹英求(東)、崔炳武(東)、辛兌鉉(東)、鄭在覺(東)、李仁榮(朝)	江部定(國)、原田正平(朝)、原田平三郎(國)*、山路時雄(國)、嶋崎昌(東)	5/ 5/ 10
1938年3月	盧聖錫(朝)	有久善夫(國)、香山陽坪(東)、末松修(東)、西見信夫(國)、橋本治平(國)、峯崎康忠(國)、松田銀治	1/ 7/ 8
1939年3月	無	無	0/ 0/ 0
1940年3月	金錫亨(朝)、朴時亨(朝)	秋本太二(東)、鈴木靜一(國)	2/ 2/ 4
1941年3月	金光濟鎮(平南)#	大熊正立、太田朝夫、篠澤正、玉木實	1/ 4/ 5
1941年12月	梅原毅一(黃海)#、金川相五(全南)#	五味正道、佐藤博、堀內道生	2/ 3/ 5
1942年9月	無	秋月徹、池田勝、田村卓夫	0/ 3/ 3
入學年月	朝鮮籍學生	日本籍學生	人數(朝/日/小計)
1940年4月	權重嶽	無	1/ 0/ 1
1941年4月	菊村香堆(慶南)#、金廷鶴、竹內研次郎(京畿)#、金光得中(江原)#、	松井八郎	4/ 1/ 5
1942年4月	金澤信忠(慶北)#、金光聖七(慶北)#、松原久也(忠北)#	植松正一、梶川俊夫、櫻井元太郎、習野重義、二宮啟任、三上一夫、宮川秀一、赤澤秀子、中村秋男	3/ 9/ 12
1942年10月	平松秀康(平北)#、松山純一(京畿)#	橋詰安四郎	2/ 1/ 3

* 修業年限超過3年者。

根據籍貫判定其為朝鮮籍。

資料來源：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同窓會編：《會員名簿》(京城：該會，1940年)，頁12-57。京城帝國大學：《京城帝國大學一覽》(京城：該校，1940年)，頁315-319。京城帝國大學：《京城帝國大學一覽》(京城：該校，1942年)，頁234-235、259-260。

引用書目

- 「田中則雄捐書清單」，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館藏。網址：http://www.lib.ntu.edu.tw/CA/rules/gift_3.htm，
下載日期：2009年6月21日。
- 〈朝鮮歷史——維基百科〉，網址：<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F%93%E5%9C%8B%E5%8F%B2>，
下載日期：2009年7月20日。
- 《京城帝國大學一覽》，1940-1942。
- 《國立臺灣大學校刊》，1948。
- 《臺北地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研究年報》，第1-7輯。
- 《臺灣時報》35（1922年6月）。
-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 Eijkman A.J.、Stapel F. W.（著）、村上直次郎、原徹郎（譯）
1942 《蘭領印度史》。東京：東亞研究所。
- Ludwing Riess（著）、吉國藤吉（譯）
1898 《臺灣島史》。東京：富山房。
- むな生
1897 〈梗概及評論：臺灣島史〉，《史學雜誌》8(6): 602-604。
- 大久保利謙
1997 《日本の大学》。東京：玉川大学出版部。
- 小田省吾
1934 《辛未洪景來亂の研究》。京城：小田先生頌壽記念會。
- 小葉田淳（著）、張迅齋（譯）
1979 《海南島史》。臺北：學海出版社。
- 中村孝志（撰）、陳俐甫（譯）
1996 〈臺北帝國大學的日子〉，《Academia：臺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創刊號: 178。
- 中見立夫
1992 〈日本の東洋史学黎明期における史料への探求〉，收於神田信夫先生古稀記念論集編纂委員會編，《清朝と東アジア：神田信夫先生古稀記念論集》，頁100-104。東京：山川出版社。
- 井上秀雄
1972 《古代朝鮮》。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
- 太田肥洲（編）
1940 《新臺灣を支配する人物と産業史》。臺北：臺灣評論社。
- 加藤繁、松田壽南
1929 〈彙報：藤田博士逝く〉，《史學雜誌》40(4): 119-125。
- 古川隆久
1998 《皇紀・万博・オリンピック：皇室ブランドと經濟發展》。東京：中央公論社。

永島廣紀

- 2005 〈日本における近現代日韓關係史研究〉, 收於日韓歷史共同研究委員會編, 《日韓歷史共同研究報告書: 第3分科篇》, 下卷。東京: 日韓歷史共同研究委員會。

末松保和

- 1949 《任那興亡史》。東京: 大八洲出版。
 1995 《末松保和朝鮮史著作集2: 新羅の政治と社會》, 下冊。東京: 吉川弘文館。
 1996a 《末松保和朝鮮史著作集4: 古代の日本と朝鮮》。東京: 吉川弘文館。
 1996b 《末松保和朝鮮史著作集5: 高麗朝史と朝鮮朝史》。東京: 吉川弘文館。
 1997 《末松保和朝鮮史著作集6: 朝鮮史と史料》。東京: 吉川弘文館。

田中則雄

- 1999 《醬油から世界を見る: 野田を中心とした東葛飾地方の對外關係史と醬油》。流山: 崙書房。

白永瑞

- 2000 〈想像のなかの差異、構造のなかの同一: 京城帝國大學と臺北帝國大學の比較からみる殖民地近代性〉, 《現代思想》30(2): 8-17。
 2005a 〈「東洋史學」的誕生與衰退: 東亞學術制度的傳播與變形〉, 《臺灣社會研究季刊》59: 269-294。
 2005b 〈東亞歷史教科書和歷史教育〉, 《二十一世紀》90: 4-13。

伊能嘉矩

- 1928 《臺灣文化誌》。東京: 刀江書院。

吉田晶

- 1979 《日本と朝鮮の古代史: 共同研究》。東京: 三省堂。

朴天秀

- 2007 《加耶と倭: 韓半島と日本列島の考古学》。東京: 講談社。

朴光賢

- 2002 〈京城帝國大學と「朝鮮学」〉。名古屋: 名古屋大學大学院人間情報學研究科博士論文。

江上波夫(編)

- 1992 《東洋学の系譜》。東京: 大修館書店。
 1994 《東洋学の系譜》, 第2集。東京: 大修館書店。

坂元義種

- 1978 《古代東アジアの日本と朝鮮》。東京: 吉川弘文館。

西村朝日太郎

- 1986 〈學界のヨブ・馬淵東一外傳〉, 收於馬淵東一先生古稀紀念論文集編集委員會編, 《馬淵東一先生古稀紀念: 社會人類学の諸問題》, 頁486-488。東京: 第一書房。

吳文星

- 1998 〈日治初期日人對臺灣史研究之展開〉, 收於中華民國史專題討論會秘書處編, 《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四屆討論會》。臺北: 國史館。
 2008 《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臺北: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吳密察

- 1997 〈「歷史」的出現〉, 收於黃富三等主編, 《臺灣史研究一百年: 回顧與研究》。臺北: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吳密察（著）、食野充宏（譯）

- 2005 〈植民地大学とその戦後〉，收於吳密察等編，《記憶する台湾：帝国との相剋》。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周婉窈

- 2008 〈中日韓共通教科書範圍應擴及臺灣〉，《大紀元》，4月19日。網址：<http://www.epochtimes.com/b5/8/4/19/n2088210.htm>，下載日期：2009年7月28日。

周佳榮

- 2001 〈陳荊和教授著述目錄〉，《當代史學》4:4（2001年12月），網址：<http://www/hkbu.edu.hk/~sosc1/hist/index.html>，下載日期：2009年7月30日。

村上直次郎

- 1897 〈臺灣新港社文書〉，《史學雜誌》8(7): 674-683。

村上直次郎（譯）、中村孝志（校注）

- 1970 《バタヴィア城日誌》，第1冊。東京：平凡社。
1972 《バタヴィア城日誌》，第2冊。東京：平凡社。
1975 《バタヴィア城日誌》，第3冊。東京：平凡社。

岩生成一

- 1987 《續南洋日本町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

岩生成一等

- 2000 〈先学を語る 村上直次郎博士〉，收於財団法人東方學會編，《東方学回想 I：先学を語る（1）》，頁135-164。東京：刀水書房。

南方人文研究所（編）

- 1943 《南方人文研究所要覽》。臺北：南方人文研究所。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同窓會（編）

- 1940 《會員名簿》。京城：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同窓會。

東京帝國大學（編）

- 1934 《東京帝國大學五十年史》，上冊。東京：東京帝國大學。

松本巍（著）、蒯通林（譯）

- 1960 《臺北帝國大學沿革史》。臺北：蒯通林。

邱景墩、陳昭如

- 1996 〈戰前日本の帝國大學制度與臺北帝國大學〉，《Academia：臺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創刊號：4。

金井圓

- 1988 〈岩生成一先生を偲ぶ〉，《史學雜誌》97(6): 1,123-1,124。

金錫亨（著）、末松保和、李達憲（譯）

- 1960 《朝鮮封建時代農民の階級構成》。東京：学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

柯設階

- 1976 〈淡水牛津學堂沿革〉，《臺灣風物》26(2): 18-19。

柳鏞泰

- 2007 〈東北亞歷史紛爭的論理及其淵源：為了溝通的省察〉，《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History》4(2): 128-139。

原徹郎

1943 《南方文化講座》，第1冊。東京：三省堂。

1944 《南方文化講座》，第3冊。東京：三省堂。

桑田六郎

1993 《南海東西交通史論考》。東京：汲古書院。

桑田六郎等

2000 〈先學を語る、藤田亮策先生〉，收於財団法人東方學會編，《東方学回想V：先学を語る（4）》，頁33-69。東京：刀水書房。

馬越徹

1995 《韓国近代大学の成立と展開：大学モデルの伝播研究》。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曹永和

2000 《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2008 〈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的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八十週年系慶講座」演講紀要，11月1日，網址：<http://tw.myblog.yahoo.com/jw!uduCo2SGHRYWizLEAu0T/article?mid=358&prev=-1&next=351>，下載日期：2009年4月10日。

曹銘宗

1999 《自學典範：臺灣史研究先驅曹永和》。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許雪姬（總策畫）

2004 《臺灣歷史辭典》。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許雪姬

2007 〈楊雲萍教授與臺灣史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報》39: 1-75。

陳昭如

1997 〈初探臺北帝國大學政學科的法學教育與法學研究〉，《Academia：臺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2: 41-62。

陳偉智

1996 〈文政學部：史學科簡介〉，《Academia：臺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創刊號: 85-88。

陳瑋芬

2005 《近代日本漢學的「關鍵詞」研究：儒學及相關概念的嬗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曾士榮

1997 〈從「臺北帝國大學」到「臺灣大學」：戰後文化重編之個案研究（1945-1950）〉，《Academia：臺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2: 1-12。

朝鮮史研究會（編）

1966 〈青山公亮博士略歴および朝鮮史關係著作目録〉，收於朝鮮史研究會編，《朝鮮史研究會論文集》，第二集，頁121-124。東京：朝鮮史研究會。

1932-1938 《朝鮮史》，37冊。京城：朝鮮總督府。

黃英哲

- 2006 〈戰後初期臺灣之臺灣研究的展開：一個歷史斷裂中的延續〉，《臺灣文學研究集刊》2: 114、119-121。

楊雲萍

- 1939 〈國立臺灣大學と臺灣の研究(中)〉，《臺灣日日新報》，2月16日，第3版。

葉碧苓

- 2007 〈臺北帝國大學與日本南進政策〉。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2008 〈村上直次郎の臺灣史研究〉，《國史館學術集刊》17: 1-35。

旗田巍

- 1962 〈日本における東洋史学の伝統〉，《歴史学研究》270: 28。

國立臺灣大學同學會

- 1947 《會員名錄》。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同學會。

臺灣新民報社(編)

- 1937 《臺灣人士鑑》，昭和12年。臺北：臺灣新民報社。

歐素瑛

- 2006 《傳承與創新：戰後初期臺灣大學的再出發(1945-1950)》。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

箭內健次

- 1941 〈近世の外交〉，收於箭內健次，《新講大日本史第9卷：日本外交史》。東京：雄山閣。

編者

- 1900 〈彙報：臺灣島史の行衛〉，《史學雜誌》11(1): 98-99。

- 1936 〈彙報：國史大學院例會〉，《史學雜誌》47(8): 1032-1033。

蔡錦堂

- 2007 〈「紀元二千六百年」的日本與臺灣〉，《師大臺灣史學報》1: 51-88。

鄭用錫(著)、林文龍(點校)

- 1998 《淡水廳志稿》。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鄭圭永

- 1995 〈京城帝国大学に見る：戦前日本の高等教育と国家〉。東京：東京大学博士論文。

鄭麗玲

- 2001a 〈帝國大學在殖民地的建立與發展：以臺北帝國大學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 2001b 〈日本殖民地高等教育政策之轉折與發展：以京城帝國大學與臺北帝國大學之設立為例〉，《臺灣風物》51(2): 87-137。

藤田亮策

- 1963 《朝鮮學論考》。奈良：藤田先生記念事業會。

關志昌

- 1984 〈魏建功〉，收於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第6冊，頁475-478。臺北：傳記文學雜誌社。

Comparison of History Courses Offered at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and Keijo Imperial University (1926-1945)

Pi-ling Yeh

ABSTRACT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the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was established in Taiwan and the Keijo Imperial University, in Chaoxian. These two colonial universities both offered history courses. The history courses taught at Japanese universities comprised three areas, namely the history of Japan, the East and the West. However, when such history courses were offered in colonial universities, there were some changes made. The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in Taiwan changed the course History of the West into History of Nanyang; while the Keijo Imperial University in Chaoxian replaced the course History of the West with History of Chaoxian. The lectures on History of Nanyang given at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used to include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of Nanyang, the learning of Dutch and Spanish languages, the Historical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other countries of Nanyang, 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ans in Nanyang, the History of Taiwan and the Study of Books Specialized in Nanyang History. Over a period of 17 years (1928-1945), the faculty members included Iwao Seiiti, Yanai Kenji and Murakami Naojiro. There were 62 graduates, but only two, She-jie Ke and Liang-biao Zhang, were Taiwanese. Upon graduation, neither of them pursued further in related studies. On the other hand, at the Keijo Imperial University, there were also lectures on History of Chaoxian such as Historiography of Chaoxi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Chaoxian, History of Xinluo, History of Gaoli, History of Chaoxian in Li Period and the Study of Books Specialized in Chaoxian History. Over a period of 19 years (1926-1945), the faculty members included Imanisi Ryu, Oda Syogo, Hujita Ryosaku and Suematu Yasukazu. Among 121 graduates, one-third (around 40 graduates) were from Chaoxian. Many of them continued research in fields related to History of Chaoxian, and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sum, the number of courses, the size of the faculty and the

student population at the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were all smaller than those of the Kejyo Imperial University. After World War II, the course on History of Nanyang was discontinued at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while the course on the History of Taiwan under Dutch and Spanish rule was replaced by History of China, which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research. Compared with Taiwan, Korea continued their research on history of Chaoxian with no interruption. Hence, Korea's achievement in the research on History of Korea, History of Sino-Korean Relations, and History of China was noteworthy in terms of both high quality and large quantity.

Keywords: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Kejyo Imperial University, Taiwan History, History of Nanyang, History of Chaoxian